晚唐五代時期瓷器八棱瓶及其相關問題

邱寧斌
上海書畫出版社

提　　要

晚唐五代時期瓷器八棱瓶的基本特徵是長頸、腹部和頸部有八條凸起的棱綫裝飾，也有素面呈圓鼓腹者。本文首先梳理八棱瓶的相關材料，著重介紹近年來浙江上林湖後司嶴窯址出土的越窯青瓷八棱瓶標本，以及新發現的兩件邢窯白瓷八棱瓶。進而討論八棱瓶的裝飾問題，認為其造型來源於伊斯蘭玻璃器。重點論述八棱瓶的使用功能和文化內涵，認為其與佛教關係密切，可能是作為「香水瓶」、「七寶瓶」、「淨瓶」使用；結合《唐后行從圖》和墓葬壁畫的圖像材料，論證八棱瓶在世俗生活中用作潔淨、禮儀用具，用來盥洗、添香。最後指出八棱瓶造型的瓷器還出現在後世的汝窯和高麗青瓷中，值得留意思考。

關鍵詞：八棱瓶、越窯、邢窯、佛教、玻璃器、香水瓶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 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後司嚳窯址及上林湖水下遺存進行了考古發掘和勘探工作，後司嚳窯址位於慈溪市上林湖中部西岸，編號 Y66，是上林湖越窯窯址群最核心的區域，此次發掘出土了包括秘色瓷在內的大量晚唐五代時期越窯青瓷精品。[1] 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後司嚳窯址出土了越窯八棱長頸瓶。（圖 1）

自 1987 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中室出土一件越窯八棱長頸瓶後，八棱瓶以其獨特的造型和青翠的釉色，成為中國陶瓷史上的名品。而對八棱瓶的研究也就此展開，馮先銘、李輝柄等根據文獻記載和窯址調查資料認為八棱瓶為浙江越窯的產品。[2] 而關於法門寺出土八棱瓶是否屬於「秘色瓷」的範疇，學者們持不同的意見，以禚振西、韓偉、王倉西等為代表的陝西學者認為八棱瓶雖不見於《衣物帳》記載，但從工藝、釉色、器形等方面來看應屬於「秘色瓷」；[3] 而宋伯胤則認為這類八棱瓶有一些傳世品，也見於其他墓葬出土，不屬於「御用」，樣式和釉色也達不到「秘色瓷」的標準。[4] 另一方面，呂建福、王倉西認為法門寺八棱瓶與密教的宗教儀式有一定關係。[5] 此外呂成龍還介紹了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三件器形相近的越窯青瓷瓶；[6] 陸明華對八棱瓶進行了綜合性的梳理，對八棱瓶的等級和分期做了有益的探討。[7]

而此次後司嚳窯址的發掘，在考古學上證明了這類越窯八棱瓶的確切產地，同時也增進了我們對其成型工藝、裝燒方式等方面的瞭解。前輩學者已做了很多有益的探討，後司嚳窯址的考古發現也提供了新的材料，而圍繞著八棱瓶造型、裝飾、功用等相關議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岳明、鄭建明），〈浙江上林湖發現後司嚳唐五代秘色瓷窯址〉，《中國文物報》，2017 年 1 月 27 日，008 版。

2 馮先銘，〈法門寺出土的秘色瓷〉，《文物》，1988 年 10 期，頁 36-37；李輝柄，〈談法門寺出土的越窯青瓷〉，《文物》，1988 年 10 期，頁 38-39。

3 禚振西、韓偉、韓金科，〈法門寺出土唐代秘色瓷初探〉，《文博》，1995 年 6 期，頁 27-32、35；王倉西：〈法門寺地宮出土秘色瓷幾個問題的探討〉，《文博》，1995 年 6 期，頁 18-26。

4 宋伯胤，〈「秘色越器」辯證〉，收入張豈之、韓金科主編，《首屆國際法門寺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頁 241-249。

5 呂建福，〈法門寺出土文物中的有關密教內容考釋〉，收入張豈之、韓金科主編，《首屆國際法門寺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頁 151-163；王倉西，〈法門寺地宮出土秘色瓷幾個問題的探討〉，頁 18-26。

6 呂成龍，〈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三件越窯秘色瓷瓶〉，收入汪慶正主編，《越窯．秘色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 62-63。

7 陸明華，〈秘色瓷八棱瓶再研究〉，收入汪慶正主編，《越窯．秘色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 64-65；另見陸明華，〈唐代秘色瓷有關問題探討〉，《文博》，1995 年 6 期，頁 77-85。

在正式進入討論前，首先對八棱瓶這類器物進行概念上的解釋。八棱瓶顧名思義，其最大的一個特徵是器物的整體裝飾有八條凸起的棱線。其基本特徵是細長頸、直口，器身大體為球形（或稱為「鼓腹」），一般為圈足。頸部和器身被八條棱線分割為八個面，頸、身的高度比約為一比一，或頸部高度大於器身。也有一類素面、無八棱裝飾的長頸瓶，整體造型與八棱瓶一致，與後者應屬同一類器物，本文稱之為「鼓腹長頸瓶」。此外，另一點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討論的「八棱瓶」，其生產年代主要為九世紀後半的晚唐時期，但據考古地層、器物類型，以及圖像材料分析，可知這類器物年代下限可至十世紀上半，故本文所聚焦的時段為晚唐五代時期。

一、越窯八棱瓶的考古發現及收藏

早在 1954 年，北京故宮博物院陳萬里先生就在浙江上林湖採集到了一片越窯八棱瓶腹部的殘片。[8]（圖 2）這是有關八棱瓶第一次科學的調查資料，雖然當時並未引起足夠的注意，但後來學者在論證法門寺地宮出土「秘色瓷」的產地時也多有引用。

1956 年陝西西安西郊棗園唐咸通十二年（871）張叔遵墓出土了一件越窯青瓷八棱長頸瓶，高 22.3 公分，通體呈八棱形，直頸，鼓腹，圈足，頸部與肩部結合處有凸起的三道弦紋，釉色青翠、勻淨，現藏於陝西歷史博物館。[9]（圖 3）這座墓葬非常重要，可惜沒有公佈具體的考古報告，但通過墓誌我們可以瞭解到墓主人張叔遵的身份及信仰，對於我們瞭解這類八棱瓶的使用情況有著重要的意義，下文中會有詳細論述。

1978 年餘姚縣文管會在上林湖（原屬餘姚縣，現屬慈溪市）採集到一件較完

8 馮先銘先生〈法門寺出土的秘色瓷〉一文中有提到「另 1954 年故宮博物院在餘姚上林湖晚唐遺址裡採集到為數不多的八棱瓶遺物碎片，也可資對比」（參見注 2，頁 37）。又呂成龍先生在〈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三件越窯秘色瓷瓶〉一文中明確提到北京故宮藏八棱瓶殘片為陳萬里先生所採集（參見注 6，頁 63）。另外陳萬里先生在 1954 年冬到上林湖調查，並且提到「因此也就可以說上林湖西岸的出品，是上林湖的主流。從調查所得的碎片上看，也證實了這一點」，參見陳萬里，〈最近調查古代窯址所見〉，《文物參考資料》，1955 年 8 期，頁 111-113；後收入氏著，《陳萬里陶瓷考古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7），頁 199-202。後來上林湖系統調查和發掘證明了這一點，八棱瓶也主要在這一區域發現。

9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段紹嘉），〈介紹幾件陝西出土的唐代青瓷器〉，《文物》，1960 年 4 期，頁 48，封二圖四。清晰的彩色圖版見今井敦，《青磁》，收入平凡社編，《中國の陶磁》（東京：平凡社，1997），第 4 冊，圖 27。

整的八棱瓶，殘高 19.5 公分，腹徑 11.6 公分，底徑 7.8 公分。（圖 4）八棱狀，細長頸，鼓腹，矮圈足。因燒造瑕疵頸部彎曲，且頸部裝飾有三道凸起弦紋，外底刻「公」字，胎質細膩，釉面勻淨。[10]

1980 年代朱伯謙等在調查上林湖窯址時在莊基窯址中採集到八棱瓶的口頸部和腹部的殘片，口頸部作細長的圓筒形，腹部有直棱，棱線突出，雙棱之間的腹壁內凹。[11] 林士民也提到在上林湖施家 （Y66）、莊基（Y60、Y61）、後司嚣（Y63）出土了八棱瓶的肩、頸和底部標本。[12] 謝純龍主編的《上林湖越窯》一書中在介紹上林湖遺址調查出土的文物時，提到上 Y61 窯址（莊基）有「八棱淨水瓶，標本上 Y61:29，僅存長頸、肩和足部。施青釉，足端刮釉，有泥點痕」。[13]（圖 5）三則材料都指向了莊基窯址，由於具體窯址調查時間不確定，從公佈的圖版來看，三則材料所提到的八棱瓶殘片有可能為同一組。

1987 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中室出土了一件越窯八棱瓶，地宮最後封存的時間為唐咸通十五年（874）。這件器物未列入《衣物帳》中，發掘者根據此瓶的釉質及製作工藝判斷應屬於秘色瓷。瓶高 21.5 公分，最大腹徑 11 公分，細長頸，直口，圓唇，肩部圓隆，腹部呈八棱形，圈足稍外侈。在瓶的頸肩上裝飾有與肩腹相應的八角凸棱紋三周，呈階梯狀。通體施明亮青釉，有開片。足底露胎，胎色淺灰而精緻細密。[14]（圖 6）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件八棱瓶的圈足上還刻有兩個「公」字。[15]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法門寺的考古發掘報告沒有提及，但發掘者在其研究文章中提到了地宮中室出土的這件八棱瓶，在出土時瓶內盛裝 29 顆五色寶珠，瓶口有一顆大珠覆蓋，這則信息十分重要，是了解八棱瓶功用的重要線索，下文還會

10 林士民，〈明（越）州貢窯之研究〉，收入李家治、陳顯球主編，《92 古陶瓷科學技術國際討論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陶瓷科學技術研究會，1992），頁 477-482；餘姚市文物保護管理所、餘姚市歷史文化名城明賢研究會（葉樹望主編），《餘姚文物圖錄》（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2），頁 70、219。林士民文中最早提到這件殘瓶是餘姚縣文管會在上林湖採集，但《餘姚文物圖錄》中提及此瓶為「1978 年餘姚文物部門徵集、收藏」，林士民文中黑白圖片的角度顯示此瓶因燒造瑕疵頸部為彎曲狀，筆者認為這件八棱瓶還應為上林湖窯址區採集的標本。

11 朱伯謙，〈古瓷中的瑰寶——秘色瓷〉，收入張豈之、韓金科主編，《首屆國際法門寺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頁 250-253，圖版 11-12。

12 林士民，〈浙江寧波考古述略〉，《浙東文化》，1994 年第 1-2 期合刊，頁 63-81，後收入氏著，《再現昔日的文明——東方大港寧波考古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頁 59-69；林士民，〈談越窯青瓷中的秘色瓷〉，《文博》，1995 年 6 期，頁 57-62。

13 慈溪市博物館（謝純龍主編），《上林湖越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頁 99，彩版一二：6。《上林湖越窯》一書彙集了 80 年代初到 1996 年在慈溪上林湖及相關窯區的調查資料（見序言、後記），在整理各個窯址調查所得的資料時，書中並未明確寫出所 標本的具體調查時間。

14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226，彩版二二一。

15 這條資料承蒙鄭建明先生、潘佳麗女士教示，謹致謝意。

具體論述。[16]

最新的有關越窯八棱瓶的考古發現是上述提到的 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 月浙江慈溪上林湖後司嶴窯址出土例。後司嶴窯址出土了八棱瓶長頸瓶、鼓腹長頸瓶的標本、殘件若干，目前《秘色越器——上林湖後司嶴窯址出土唐五代秘色瓷器》一書中公佈了八組相關的標本。其中較為完整的一件 TN06W04 ⑤ -1-6：6，足徑 8 公分，殘高 15.2 公分。口部殘。溜肩，鼓腹，腹部呈八棱形，圈足稍外撇。頸肩交界處飾三周與肩腹相應的凸棱紋，呈階梯狀。外底一側有一「公」字。淺灰白色胎，胎質細膩堅致；通體施青釉，釉面瑩潤。足端有多個泥點墊燒痕。[17]（圖 1-1）

除了八棱長頸瓶外，越窯還有一類直頸、鼓腹的長頸瓶，除了沒有凸起八條棱外，造型與八棱瓶一致。筆者認為兩者應為同一類器物，只不過在裝飾細節上略有不同。鼓腹長頸瓶數量發現的較八棱長頸瓶少，比較典型的標本如後司嶴窯 TN06W04 ⑤ -2-3：168，足徑 7.6 公分，殘高 10.4 公分。僅存腹部和圈足。球形腹，矮圈足外撇。頸肩交界處有一周凸弦紋。淺灰白色胎，胎質細膩堅致；通體施青釉，釉面瑩潤。足端刮釉並有多個泥點墊燒痕。[18]（圖 7）

考古發掘和窯址調查外，海內外的公私收藏也有一些實例。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有三件越窯青瓷長頸瓶，其中兩件為八棱瓶，一件為鼓腹長頸瓶。[19]

編號「新 887553」，高 22.5 公分，直口，長頸，鼓腹，呈八棱形，肩頸部裝飾有三道凸起的弦紋，底足內刻「七」字。（圖 8）整體造型與法門寺出土的八棱瓶一致，只是北京故宮的這件瓶子最大腹徑在中部，法門寺的八棱瓶最大腹徑靠近肩部。

編號「新 152932」，高 21.7 公分，直口，長頸，鼓腹，通體呈八棱形。整體造型基本與法門寺出土八棱瓶一致，只是肩腹連接處沒有裝飾三道凸起的弦紋。（圖 9）

編號「新 111759」，高 22.4 公分，直口，長頸，圓鼓腹，頸下部略外撇，通體施青釉，底足內刻數字「四」。（圖 10）

---

16 王倉西，〈法門寺地宮出土秘色瓷幾個問題的探討〉，頁 25。
1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沈岳明、鄭建明主編），《秘色越器——上林湖後司嶴窯址出土唐五代秘色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1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沈岳明、鄭建明主編），《秘色越器——上林湖後司嶴窯址出土唐五代秘色瓷器》，頁 40。
19 呂成龍，〈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三件越窯秘色瓷瓶〉，頁 62-63。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這三件長頸瓶，從圖錄公布的圖片可以看到器物底足內均寫有「新」字開頭的編號，根據北京故宮對文物編號的原則，可知以「新」字開頭編號的文物是 1949 年後北京故宮收購、接收和接受捐贈的文物的統一編號。[20] 說明這三件器物並非清宮舊藏。

除公立博物館的收藏外，2013 年慈溪博物館舉辦的「南青北白——越窯與邢窯瓷特展」中展出了一件私人收藏的八棱瓶，高 22.1 公分，足徑 8 公分，直口，長頸，肩頸部裝飾有兩道凸起的弦紋。[21]（圖 11）另有一件私人藏鼓腹長頸瓶，高 22.3 公分，足徑 8.75 公分，長頸，圓鼓腹，肩頸處有一道凸起裝飾，腹部最上端刻劃有兩道弦紋，通體施青釉，釉色青綠。[22]（圖 12）

綜合以上有關越窯八棱瓶的材料，我們可以大致判斷其生產和流通的年代。目前帶有紀年的例子是張叔遵墓（871）和法門寺地宮（874）出土的越窯八棱瓶。上林湖後司嶴窯址地層中還發現了帶有「大中（847-859）」「咸通（860-873）」與「中和（881-887）」年款窯具。根據地層出土的高品質秘色瓷的數量和比例，可知後司嶴窯址至少在「大中」年間前後開始生產秘色瓷，在「咸通」年間前後秘色瓷占相當比例，在「中和」年間前後則達到了興盛，這一過程一直持續到五代中期左右，在五代中期以後品質有所下降，而八棱瓶的標本就主要發現在「大中」到「中和」時期的地層之中。[23] 另外通過後司嶴窯址的考古發掘，八棱瓶與鼓腹長頸瓶同地層共出，如上述提到八棱瓶標本 TN06W04 ⑤ -1-6：6 和鼓腹長頸瓶標本 TN06W04 ⑤ -2-3：168，可知兩者為基本為同一時期所燒造。此外，在後司嶴窯址中，除了晚唐時期的地層外，在五代時期的地層也發現了八棱瓶和鼓腹長頸瓶的標本，造型和裝飾與晚唐時期差異不大。（圖 1-4）通過紀年墓和考古地層的材料，大致可以判斷越窯八棱瓶及鼓腹長頸瓶這一類器物的生產和流通主要在九世紀後期，其下限可能到十世紀初，即晚唐五代時期。

---

20 張海霞，〈故宮博物院文物編號整理及應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4），頁 27-28。

21 越窯博物館，《南青北白——越窯與邢窯瓷特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頁 38。

22 Sotheby's, *Fine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 (Sotheby's London, June.1995), LOT. 160；另參見 Sotheby's, Fine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 (Sotheby's New York, September.2006), LOT. 85，兩者尺寸造型均一致，疑為同一件器物。還可見 Sotheby's, Chinese Art (Sotheby's Hong Kong, November.2014), LOT. 1013, 高 21.7 公分，釉色偏黃，造型與北京故宮鼓腹長頸瓶一致。

2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岳明、鄭建明），〈浙江上林湖發現後司嶴唐五代秘色瓷窯址〉，008 版。

二、兩件白瓷八棱瓶及相關問題

除了越窯生產八棱瓶和鼓腹長頸瓶外，伴隨著近年來的考古發現以及對館藏資料的梳理，可以發現在其他的窯場也有生產同類的產品，綜合這些材料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晚唐五代時期南北方窯業的生產及交流的狀況，同時也為我們探尋八棱瓶在當時社會的使用情況提供新的視角。

（一）新見成都出土「官」字款白瓷八棱長頸瓶及相關問題

2016 年 6 月成都博物館新館正式對公眾開放，展示了成都地區出土的文物，很多不乏是首次正式公開，其中有一件「官」字款白瓷八棱瓶，館方定名為「邢窯『官』字款白瓷瓶」（圖 13）。

這件白瓷瓶高 23 公分，頸長 11 公分，最大腹徑 12 公分，頸部細長呈筒形，腹部為球形，均勻貼塑有八條凸棱，高圈足，圈足外撇，圈足內底部刻有「官」字款。此瓶出土於成都市江南館街，目前還沒有發表全面的考古報告，所以關於此瓶具體的出土情況等還不清楚。[24]

要注意的是，這件八棱瓶口部殘斷有打磨的痕跡，[25] 我們現在看到可能並非瓶子的原貌。易立在論述四川三臺出土「官」字款白瓷的相關問題時，提到 1996 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在對成都市東南的江南館街唐宋遺址進行考古勘探時，發掘出土一件「官」字款白瓷作品：「其器形為瓶，盤口、細直頸、球腹、圈足」。[26] 這裡提到的「官」字款白瓷瓶，出土地點與成都博物館所展出的白瓷八棱瓶之出土地點一致，而且都帶有「官」字款，器形也基本相同，只是易立文章中提到的白瓷瓶為「盤口」，成都博物館展出的為直口，兩者是否為同一件器物？另外王光堯先生在統計「官」和「新官」款瓷器數量時，也提到「黃曉楓女士見告成都江南館街唐宋遺址出土 1 件白瓷『官』字款長頸瓶」。[27] 這裡提到的三件成都江南館街出土的「官」字款白瓷瓶是否為同一件器物？當然這還有待日後相關的考古報告證實。

---

24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黃曉楓等），〈成都市江南館街唐宋遺址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1999）》（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 260-277。可惜簡報中並未提及本文中所探討的「官」字款白瓷長頸瓶。

25 這條資料承蒙趙娜、陳潔女士教示，謹致謝意。

26 易立，〈關於四川三臺出土「官」款白瓷的幾個問題〉，《四川文物》，2009 年 1 期，頁 60-64。

27 王光堯，〈關於越窯瓷器所見「官樣」銘的思考——兼釋「官」「新官」款的含義〉，《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五輯（2002.1），頁 174-179；後收入氏著，《中國古代官窯制度》（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頁 40-49。

筆者認為對考古出土的器物進行截斷打磨可能性極小，易立先生提到的「盤口」瓶可能指其他的器物，或為筆誤。成都博物館展出的這件長頸瓶很可能本來就是直口長頸的，只是口部有殘損，在古代為了美觀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打磨，器物原來的面貌依然保存，其整體器形與越窯的八棱瓶應該都是一致的。另外筆者 2012 年於河北內邱邢窯窯址調查時，在窯址採集到一件標本（圖 14），標本大致呈圓柱形，口部一端完整，直徑最小，另一端殘缺，內中空，殘長 9 公分，直徑 1.9 至 2.5 公分。這件標本生燒，表面基本無釉，胎質細膩潔白，應為晚唐時期邢窯的產品。該標本殘長就有 9 公分，可知並非執壺的流，筆者推測可能為長頸瓶一類器物的頸部，原型應與成都江南館街出土的白瓷八棱長頸瓶相似。

成都博物館展出的這件「官」字款白瓷長頸瓶與張叔遵墓、法門寺地宮出土的越窯八棱瓶的器形基本一致，都是直口、鼓腹、長頸。最重要的特徵是兩者都有裝飾「八棱」，越窯八棱瓶凸起的棱線是模印壓製或拉坯後削刻製作出來，這一點從窯址採集和出土的殘片中可以觀察出製作的細節，而白瓷的八棱瓶的八條棱線是貼塑出來的，兩者在裝飾工藝和技術上有差異，但所要追求的效果是一致的。故而筆者認為成都博物館展示的白瓷長頸瓶與越窯的八棱瓶是不同窯場所生產的同一類型的器物。

這件白瓷八棱瓶另一個重要的特徵是帶有「官」字款，這有助於我們瞭解其時代和性質。目前國內外發現的帶有「官」字款的瓷器已有數百件，[28] 其中「官」字款的白瓷最早紀年的實例是河北靈壽縣晚唐景福二年（893）墓出土的兩件白瓷缽，[29] 最晚的例子是遼寧省遼開泰九年（1020）耿延毅夫婦墓出土的一件白瓷蓋罐，[30] 可知「官」字款白瓷器生產和流通最主要時段集中於十世紀，至遲九世紀末就已經開始生產，一直延續到十一世紀初期。需要指出的是，成都出土的這件「官」字款八棱瓶除簡單貼塑的八條棱線外，並無過多的裝飾，整體風格與十世紀後半、十一世紀初，如河北定州靜志寺塔基（977）、靜眾院塔基（995）及內蒙古陳國公主墓（1018）出土的帶有剔刻裝飾的「官」字款白瓷有較大差別。[31] 而與浙江臨安錢寬

28 對於「官」字款白瓷的統計和編年筆者主要參考謝明良先生的研究，詳見謝明良，〈有關「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含義的幾個問題〉，《故宮學術季刊》，5 卷 2 期（1987 冬），頁 1-38；後增補收入氏著，《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出版社，2007），頁 79-118。

29 王莉英、穆青，《定窯瓷鑒定與鑒賞》（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03），頁 73、頁 100 注 31，轉引自謝明良〈有關「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含義的幾個問題〉，頁 112。

30 朝陽地區博物館（朱子方、徐基），〈遼寧朝陽姑營子遼耿氏墓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1983 年 3 期，頁 168-195。

31 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 年 8 期，頁 39-51。另外關於定州

墓（900）、水邱氏墓（901）出土的十世紀初帶有「官」字款的白瓷風格相近，造型都相對厚重且簡約，無過多裝飾。[32] 在結合上文中對越窯八棱瓶的時代判斷，筆者認為成都出土的這件「官」字款白瓷八棱瓶時代大致在九世紀末到十世紀初，也就是唐末五代初期。

關於「官」字款瓷器的含義，前輩學者已經做了豐富的研究和討論，在此不再贅述。[33] 雖然學界並未對「官」字款瓷器的認知達成共識，但總體來說館藏和出土的相關器物大都製作精美，多出土於高等級的墓葬、遺址中，所以「官」字款的瓷器應屬於當時高等級、高質量的「奢侈品」。[34] 本文所討論的成都出土的「官」字款八棱瓶製作精美，品質較高，也應與官方、貴族的使用有關。如四川地區發現的「官」字款瓷器除了這件八棱瓶外，還有邛崍窯窯址發現的前蜀乾德六年（924）帶有「官樣」銘的印模，以及三臺地區窖藏出土的幾件「官」字款白瓷，[35] 三臺在晚唐時期為劍南東川節度使治所，窖藏的性質或與此有關。

另一個線索也可以參考，成都博物館展示的這件白瓷八棱瓶出土於成都市江南館街唐宋遺址，江南館街經文獻考證，結合考古發掘資料，證實該區域為唐代大聖慈寺的範圍。[36] 大聖慈寺為唐宋時期成都地區最為著名的寺院，宋代志磐《佛祖統記》卷四十「肅宗」載：「上皇駐蹕成都，內侍高力士奏，城南市有僧英千，於廣衢施粥以救貧餒。願國運再清，克復疆土。欲於府東立寺為國崇福。上皇悅，御書大聖慈寺額，賜田一千畝，敕新羅全禪師為立規制，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區。」[37] 大聖慈寺在建立之初就與唐皇室關係密切，而且寺院的規模極大。及至唐末

兩座塔基出土文物還可以參考出光美術館，《地下宮殿の遺實——中國河北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展》（東京：出光美術館，1997），以及浙江省博物館、定州市博物館編，《心放俗外——定州靜志、靜眾佛塔地宮文物》（北京：中國書店，2014）。內蒙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館編，《遼陳國公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3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晚唐錢寬夫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有關十世紀中國陶瓷裝飾風格的變化，長谷部先生有著較為敏銳的觀察，參考長谷部樂爾，〈十世紀の中國陶磁〉，《東京国立博物館紀要》，第 3 号（1968.3），頁 177-242。

33 謝明良，〈有關「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含義的幾個問題〉，頁 85-96。

34 邱寧斌，〈割據時代下的瓷器與瓷業——以晚唐五代官方製瓷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碩士論文，2018）。

35 景竹友，〈三臺出土的白定「官」字款瓷器〉，《四川文物》，1996 年 1 期，頁 57-58；器物的彩色圖片可見鐘治，〈三臺館藏瓷器擷英〉，《故宮文物月刊》，257 期（2004.8），頁 67-68，圖一～五。

36《成都城坊古跡考》提到「寺極盛時，西抵今錦江街、江南館街、金玉街、棉花街一帶」，參見四川省文史館，《成都城坊古跡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頁 400；另外〈成都市江南館街唐宋遺址發掘簡報〉中也提到了江南館街毗鄰大慈寺，見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黃曉楓等），〈成都市江南館街唐宋遺址發掘簡報〉，頁 260-277。

37 （宋）志磐《佛祖統記》卷四十．肅宗至德元載條，《大正藏》第四九卷．史傳部一所收。轉引

五代初期，王建經營蜀地，尤其重視佛教的發展，《益州名畫錄》載：「乾寧（894-898）初，王蜀先主府城，精舍不嚴，禪室未廣，遂於大聖慈寺大殿東廡起三學延祥之院，請德齊於正門西畔畫『南北二方天王』兩堵」，又「光化年（898-901）王蜀先主受昭宗敕置生祠，命德齊於高道興同手畫西平王儀仗……」[38] 可見大聖慈寺在唐五代時期規格地位極高，在其範圍內出土高等級的「官」字款白瓷八棱瓶也在情理之中。

（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盈」字款八棱罐再思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有一件白瓷「盈」字款八棱罐（圖 15），這件八棱罐呈球型，腹部裝飾有凸起的八條棱線，圈足略外撇，底部釉下陰刻「盈」字。[39] 北京故宮的這件八棱罐口部有比較明顯的打磨痕跡，口部以上均殘缺，但與成都出土的「官」字款白瓷八棱瓶比較，後者頸部以下的部分與北京故宮的瓜棱罐造型基本一致，都裝飾有八條凸起的棱線。[40] 兩者區別主要在於成都博物館的白瓷八棱瓶腹部下方弧度更大，整體呈一個球型，且圈足更高，外撇的幅度更大；而北京故宮的八棱罐腹部下半部分至圈足的過渡較為平緩，圈足更直且矮。筆者推測北京故宮的八棱罐原本應有細長的頸，後因某種原因被打磨掉了。

另外北京故宮的這件「盈」字款罐不見於其他該館藏品圖錄，北京故宮研究者介紹院藏唐代白瓷的相關文章中也未提及這件器物，[41] 僅在介紹館藏的古代窯址標本的書中刊載了彩色圖版。[42] 另外在《千年邢窯》一書中有公布這件「盈」字款八棱罐的底部圖，從底圖上可以看到這件器物的編號「資 48」。[43] 北京故宮博物院把資料性質的文物藏品前面冠以「資」字來編號，這是北京故宮當年在評定文物等級

自王衛明，《大聖慈寺畫史叢考——唐、五代、宋時期西蜀佛教美術發展探源》（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頁 42-43。

38 （宋）黃休複撰，何韞若、林孔翼校，《益州名畫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頁 21-23。

39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中國古代窯址標本：河北》（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頁 161；另見趙慶剛、張志忠主編，《千年邢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170。

40 林容伊也注意到北京故宮收藏的這件「盈」字款瓜棱罐與越窯八棱瓶可能為同一類器物，當時成都出土的「官」字款長頸瓶尚未公開展出，參見林容伊，〈唐宋陶瓷與西方玻璃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第三章第七節長頸瓶，頁 70-72。

41 王莉英、馮小琦、陳潤民，〈從故宮博物院藏品談早期白瓷〉，收入上海博物館編，《中國古代白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博物館，2005），頁 373-381；黃衛文，〈故宮博物院藏唐代白瓷研究〉，收入中國古陶瓷學會編，《越窯青瓷與邢窯白瓷研究》（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頁 307-322。

42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中國古代窯址標本：河北》，頁 161。

43 趙慶剛、張志忠主編，《千年邢窯》，頁 170。

時，對於「文物」與「非文物」之間藏品的稱呼。[44] 由此可見，可能因為這件罐子口部的殘缺，所以北京故宮才將其歸入「文物資料」或「標本」。

黃衛文梳理了北京故宮收藏的 500 餘件唐代白瓷，其中絕大部分為上世紀 50 到 60 年代入藏，只有「徐六師記」款白瓷皮囊壺和一件白釉瓜棱水丞為清宮舊藏，然不知黃衛文統計的 500 餘件北京故宮收藏的唐代白瓷中，是否包含本文所討論的「盈」字款白瓷罐？目前尚缺乏北京故宮收藏的這件白瓷罐更詳細的資料，無法確定其入藏的年代。若此罐為清宮舊藏，倒也符合清宮對珍貴的帶有殘損的瓷器進行打磨修整的傳統。

根據考古出土的紀年材料，可知「盈」字款瓷器主要流行於九世紀。[45] 結合對越窯八棱瓶以及成都出土「官」字款白瓷長頸瓶的時代判斷，北京故宮收藏的這件「盈」字款八棱罐的時代大致應在九世紀後半。

早在 1987 年謝明良先生與陸明華先生就不約而同地指出「盈」款瓷器與唐代皇帝私庫「大盈庫」有一定的關係，[46] 這個觀點基本獲得學界的共識。雖然有一部分「盈」字款的器物會在長安以外的地區甚至非高等級墓葬發現，但絕大部分的「盈」字款瓷器和標本出土於長安地區的大明宮、青龍寺、西明寺以及長安外的如晉陽古城一號建築基址、邢臺清風樓等高規格或帶有官方性質的遺址。[47] 這也意味著北京故宮的這件「盈」字款八棱罐與法門寺出土的八棱瓶一樣，在晚唐時期都屬於等級規格很高的瓷器。

---

44 張海霞，〈故宮博物院文物編號整理及應用〉，頁 27，註釋 2。實際上這樣的文物分類編號方法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當時不少定為「資」類別的文物標本在今天看來都是十分珍貴的文物，就如北京故宮收藏的一件清宮舊藏汝窯天青釉青瓷洗，底部有乾隆時期刻的「丙」字款，洗的一部分可能由於大火或者染色而發黑，但汝窯傳世品不足百件，仍十分珍貴，不過這件汝窯青瓷洗也是被定為「資 89（資陶瓷 12）」，所以同樣作為「文物資料」的「盈」字款白瓷八棱罐的重要性值得我們重新思考和研究。

45 彭善國，〈試析「盈」字款瓷器〉，《考古與文物》，2007 年 1 期，頁 90-94。

46 謝明良，〈有關「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含義的幾個問題〉，頁 92；陸明華，〈邢窯「盈」字及定窯「易定」考〉，《上海博物館集刊》，1987 年 4 期，頁 257-262。

47 王長啟，〈西安市出土「翰林」「盈」字款邢窯白瓷罐〉，《文物》，2002 年 4 期，頁 83-84；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翟春玲、王長啟），〈青龍寺遺址出土的「盈」字款珍貴白瓷器〉，頁 6-12+4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隊（安家瑤），〈唐長安西明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0 年 1 期，圖版柒：3。晉陽古城一號建築遺址出土了編號 T10503G4:34 刻有「盈」字款的白瓷標本，同時遺址還伴出了「官」、「新官」、「易定」等帶有刻款的白瓷標本，發掘者推測晉陽古城一號建築基址為有一定級別的寺院建築，參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晉陽古城一號建築基址》（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 167-170，圖版五三：1。2001 年河北邢臺市區清風樓一帶舊城改造出土了一批「大盈」款標本，等級和品質都很高，清風樓一帶為邢州府治的核心地帶，學者推測這裡出土「大盈」款標本或與地方向朝廷貢瓷有關，參見支廣正，〈唐代邢窯貢瓷「盈」字款研究〉，《文物春秋》，2006 年 5 期，頁 39-51。

關於北京故宮這件「盈」字款八棱罐的產地，結合器物底部「盈」字的釉下刻款以及較為利落的修足方式，筆者認為應是晚唐時期邢窯的產品。邢窯窯址及邢臺地區出土了大量「盈」字款的標本和器物，[48] 是否帶有「盈」字款已經成為判別一件器物為邢窯生產的重要特徵，但必須要指出的是，隨著近年考古發掘及新材料的發現，越窯、衡州窯、壽州窯以及低溫釉陶器等其他品種的陶瓷器上也發現有「盈」字款，[49] 這些其他窯口的「盈」字款器物品質不一，也有燒造完成後再坨刻的「盈」字的情況，我們需要重新認識「盈」字款瓷器的內涵。[50]

通過對北京故宮這件「盈」字款八棱罐生產窯口的判別，也有助於我們判斷成都出土的「官」字款白瓷八棱瓶的產地問題。成都博物館官方將其定為「邢窯」，筆者贊同這一觀點。首先兩者的造型、裝飾等特徵都十分接近。其次 2003 年河北內邱步行街邢窯窯址也出土了帶有「官」字款的白瓷標本，[51] 器物符合邢窯一貫的特徵，與成都出土的這件「官」字款八棱瓶整體的風格一致。

三、八棱瓶與玻璃器：造型與裝飾淵源

以法門寺地宮出土的越窯八棱瓶為例，目前很多研究者都稱其為「八棱淨水瓶」或者「八棱淨瓶」，「淨瓶」或「淨水瓶」都是佛教典籍中記載的器物，與佛教的儀禮有密切的聯繫，法門寺出土的八棱瓶是否為「淨瓶」一類的器物？目前在無直接證據的情況下，本文仍以其器形稱之為「八棱瓶」或「鼓腹長頸瓶」。

---

4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王會民等），〈邢窯遺址調查、試掘報告〉，《考古學集刊》，2004 年 14 期，頁 191-237；另見王會民，〈邢窯三次發掘與收穫〉，收入中國古陶瓷學會編，《越窯青瓷與邢窯白瓷研究》（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頁 153-163。

49 2015 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慈溪上林湖荷花芯越窯遺址唐代堆積層的發掘中出土了三件寬圈足大碗，碗內心處有「盈」字印章款，為越窯窯址此類字款的首次發現，參見沈岳明等，〈2015 慈溪上林湖荷花芯越窯遺址考古發掘概況〉，《陶瓷考古通訊》，2015 年 2 期，頁 21-23。周世榮先生在介紹衡州窯產品時有提到在衡州窯窯址發現了「盈」字印紋殘片，參見周世榮，《湖湘陶瓷》（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8），頁 156。低溫釉陶器帶有「盈」字款的器物可見勿裡洞島黑石號（Batu Hitam）沉船出水的綠釉大碗，參見謝明良，〈記「黑石號」（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國陶瓷器〉，《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3 期（2002.9），頁 1-60+277；後收入氏著，《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出版社，2005），頁 81-134。另外西安民間收藏者公佈一批傳西安出土的帶有刻款的標本，有釉下的窯工刻款，也有唐代的後刻款，款識有「盈」、「大盈」、「官」等，窯口有邢窯、越窯、壽州窯、鞏義窯、低溫釉陶等，值得進一步關注，參見王泰初，〈瓷片刻款揭秘唐宮廷用瓷〉，《收藏》，2011 年 12 期，頁 62-67。

50 邱寧斌，〈割據時代下的瓷器與瓷業—以晚唐五代官方製瓷為中心〉，頁 87-98。

51 王會民、樊書海，〈邢窯遺址考古發掘有重要發現〉，《中國文物報》，2003 年 10 月 29 日，2 版；圖版見趙慶剛、張志忠主編，《千年邢窯》，頁 254；王會民，〈邢窯三次發掘與收穫〉圖一〇。

「淨瓶」也稱為「軍持」，材質有陶瓷、青銅等。器物類型有雙口或者單口，一般頸部帶有盤狀平臺或者為撇口，這種造型與其使用方式有很大關聯。在敦煌壁畫及唐宋佛畫中，都可以見到觀音手提淨瓶的例子，如法國吉美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十世紀後半的觀音菩薩坐像圖（圖 16），[52] 菩薩右手持一楊柳枝，左手提一淨瓶，有趣的是畫者最初在作畫時把淨瓶錯畫成了直頸，爾後又在淨瓶長頸的中部加上了盤狀平臺，當時補繪的痕跡依然保留下來，表明這類佛教中菩薩手持的淨瓶的頸部須有類似的盤狀平臺或是帶有撇口，這樣才便於手提。另外一個與越窯及邢窯八棱瓶時代相近的例子是日本滋賀向源寺的被定為「國寶」的十一面觀音菩薩立像（圖 17），[53] 時代為九世紀中期，這尊造像高 194 公分，菩薩左手持一淨瓶，淨瓶鼓腹、長頸、撇口，類似造型的瓶子流行於中古時期，有白瓷、三彩、陶、響銅等，也正因為有較大的撇口，才有利於手提或手持。

而本文所討論的無論是八棱瓶還是鼓腹長頸瓶，其一大特點是長頸直口，而作為彌勒菩薩身份的象徵，目前所見圖像材料中淨瓶幾乎都是夾在指間，偶有呈托舉狀的，造型基本都為單口或雙口帶盤狀平臺，亦作長頸撇口形。而直口的長頸瓶由於頸部長且直，或很難用手抓提的。但筆者也發現了一個特例，在敦煌 14 窟南壁繪有一十一面觀音像（圖 18），時代為晚唐，屬於密教畫，觀音位於經變中部，結伽坐於蓮花座上，六隻手中最下二手持一淨瓶，該瓶為長頸、鼓腹、大圈足外撇狀，造型與上述提到的成都出土的邢窯八棱長頸瓶和北京故宮收藏的鼓腹長頸瓶一致。[54] 目前筆者僅發現這一例觀音像手持直口鼓腹長頸瓶的情況，不過也從側面表明了本文所探討的這類直口長頸瓶（八棱瓶）與佛教中的淨瓶關係密切，很可能也是屬於淨瓶中的一種。但畢竟這類造型的瓶子極少出現在在中古時期菩薩手中，表明八棱瓶與上述提到的佛教中菩薩手提的淨瓶（軍持）的使用可能存在一些差異。

那麼為什麼八棱瓶和鼓腹長頸瓶會被設計為長頸直口？又為何出現「八棱」的裝飾？這種造型和裝飾的來源是什麼？

---

52 ジャック・ジエス編輯，ジャン・フランソワ・ジャリージュ、秋山光和監修，《西域美術：ギメ美術館ペリオ・コレクション》（東京：講談社，1994），第 1 卷，彩色圖版 68-1。

53 水野敬三郎、紺野敏文等編著，《密教寺院と仏像：平安の建築．彫刻 I》，收入《日本美術全集》（東京：講談社，1992），第 5 卷，彩色圖版 63。

54 敦煌研究院（段文傑主編，彭金章分冊主編），《敦煌石窟全集　密教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圖 75，頁 102；另彭金章〈莫高窟第 14 窟十一面觀音經變〉一文中有對這幅密教觀音經變圖像進行考證，其中有公佈這幅圖像的線描圖，能夠更清楚的看出觀音手持的是鼓腹長頸瓶，見彭金章〈莫高窟第 14 窟十一面觀音經變〉，《敦煌研究》，1994 年 2 期，頁 89-97。

（一）造型

八棱瓶及長頸鼓腹瓶的造型較為特別，在晚唐之前很少看到。謝明良先生指出法門寺出土的八棱瓶與伊斯蘭玻璃器器形相近，考慮到中國晚唐之前未見此類樣式，傾向認為前者的樣式或許受到年代可能更早的伊斯蘭玻璃器的影響。[55]（圖19）森達也先生也認同八棱瓶與伊斯蘭玻璃器之間有一定的關係，並進一步指出越窯八棱瓶可能影響到後來的耀州窯和汝窯。[56] 林容伊繼承謝明良、森達也的觀點，並進一步具體論證八棱瓶與西方玻璃器在造型上的聯繫，值得參考。[57]

前引謝明良先生文章中提到的伊斯蘭玻璃瓶，長頸，直口，鼓腹豐肩，器身裝飾有多條凸棱，整體造型和裝飾與法門寺地宮、張叔遵墓出土的越窯八棱瓶十分接近。還有一個細節需要注意，玻璃瓶長頸與腹部連結處往往會有凸起的條帶，不知是否由於工藝的緣故，需要額外增加玻璃條使得二者更好地連接？於是在頸腹連接處經常會看到一道或幾道凸起。[58]（圖20）當然這也可能僅僅是作為一種裝飾，而這種頸部結合處凸起的條帶似乎也影響到瓷器的八棱瓶，上述提到的越窯八棱瓶中大多數都在頸腹連接處也裝飾有數量不一的凸起的弦紋。

伊斯蘭地區這類鼓腹長頸玻璃瓶數量較多，流行於九至十二世紀，產地包括伊朗、敘利亞及中亞，不過類似的玻璃器器形早至一世紀就在羅馬地區出現。[59] 由水常雄先生認為這類玻璃瓶為盛裝薔薇水的器物，也就是香水瓶。[60] 揚之水先生梳理史料，從文獻方面論證了玻璃器與薔薇水的關係，兩者同為西來之物，作為舶來品的玻璃瓶很有可能就是作為盛裝薔薇水的容器。[61]

相對中國晚唐時期出現的瓷器八棱瓶，西方的類似器形的玻璃器出現的時間更早，延續時間更長，數量也更多，所以筆者也認為中國晚唐時期出現的八棱瓶及鼓

---

55 謝明良，〈臺灣故宮博物院藏兩件汝窯紙槌瓶及相關問題〉，收入氏著，《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3-16，圖31。

56 森達也，〈ペルシアと中國——陶磁器、金屬器、ガラスに見る東西交流〉，《陶說》，卷650（2007.5），頁20-26。

57 林容伊，〈唐宋陶瓷與西方玻璃器〉，第三章第七節長頸瓶，頁70-72。

58 Shinji Fukai, *Persian Glass*, trans. Edna B. Crawford (New York, Tokyo, Kyoto: Weatherhill/Tankosha, 1977), fig.75.

59 Stefano Carboni, *Glass from Islamic Lands*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2001), 178-179, 191-194; Stuart J. Fleming, *Roman Glass: Reflections on Cultural Chang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1999), 32, Plate E.39. 轉引自林容伊，〈唐宋陶瓷與西方玻璃器〉，頁71。

60 由水常雄，賀晶、黃海雲譯，《香水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頁25-33。

61 揚之水，〈琉璃瓶與薔薇水〉，收入氏著，《香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165-179。

腹長頸瓶可能是受到西方玻璃器的影響而產生，至於瓷器的八棱瓶、鼓腹長頸瓶是否也和玻璃長頸瓶一樣是作為薔薇水瓶，下一章節將作進一步討論。

（二）八棱裝飾

前文提及法門寺地宮、張叔遵墓出土的越窯八棱瓶以及成都江南館街出土的邢窯八棱長頸瓶，二者產地雖相隔南北兩地，但卻有諸多共同點，它們都追求瓶身八棱的裝飾，器形也十分接近。不同之處是越窯是在瓶身用模具按壓出八個平面，然後進行削刻修整，或直接在拉坯成型的圓形胎體上直接用工具進行削刻，來表現出凸起的八條棱線；而邢窯則是在瓶身貼塑八條棱線來展現八棱的表現效果。為什麼邢窯和越窯都要選擇這種裝飾？其裝飾也是和器形一樣是與西方璃器有關嗎？

中國陶瓷的凸棱裝飾，南北朝時期就已經出現，在這一時期很多的罐子上都會裝飾幾道凸起的弦紋，不過都是橫向的裝飾，像晚唐五代時期八棱瓶中這種縱向的棱線裝飾幾乎見不到。

上述謝明良、森達也兩位先生文章中提到的伊斯蘭玻璃器，以及由水常雄書中所舉的斜紋長頸瓶（圖 21），[62] 均與本文所談論的八棱瓶裝飾十分相似。這種縱向凸棱紋的裝飾在西方玻璃器中很常見，可以追溯到更早羅馬玻璃器的傳統，製作的方法有模鑄法、吹製成形再貼玻璃條（圖 22）、吹製與模子一併成形等，這些技法都在一世紀出現。[63] 對應到中國瓷器上，越窯八棱瓶是拉坯後模製削整，接近玻璃器中模鑄法；而邢窯八棱瓶是貼塑棱線，與玻璃器中貼玻璃條很接近。另外筆者 2013 年在河北內邱邢窯遺址調查的過程中，在內邱西關窯址採集到一片邢窯白瓷標本（圖 23），器形不明，推測為罐子或壺一類，為拉坯成形，內側無釉，外側施白釉，上有凸起的樹枝狀紋路，從部分釉面剝落處來看，凸起的裝飾為貼塑的棱線構成。從對越窯、邢窯八棱瓶及相關作品的製作工藝分析，晚唐五代時期以八棱瓶為代表的帶有棱線裝飾的瓷器，很可能是收到了西方玻璃器裝飾的影響。

至於為何選擇「八條」棱線作為裝飾，或許與接下來所要討論的八棱瓶與佛教的關係有關？佛教中數字「八」有特殊的含義，如「八寶」，中晚唐時期流行建造的經幢，也多為八角形。這是否影響到八棱瓶的裝飾，筆者無法回答，或許可備一說。

---

62 由水常雄編，《世界ガラス美術全集　1　古代到中世》（東京：求龍堂，1992），頁 103，圖版 211。

63 參見 Stefano Carboni, *Glass from Islamic Lands* , 11, 18-19, 31-42, 54, 109；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岡山市立オリエント美術館編，《古代ガラスの技と美：現代作家による挑 》（東京：山川出版社，2001），頁 71，轉引自林容伊，〈唐宋陶瓷與西方玻璃器〉，頁 79-80。

四、宗教到世俗：八棱瓶功能和內涵探討

八棱瓶作為晚唐時期出現並流行的一類器物，雖然目前考古發現和館藏的數量並不是很多，但其器形、裝飾以及出土情況都比較特殊，是否意味著八棱瓶這類器物在功能上有獨特性？八棱瓶在晚唐五代時期是如何被使用的？何人在使用？八棱瓶背後的文化因素又有哪些？

（一）再談張叔遵墓出土八棱瓶及相關問題

前文提到的考古出土越窯八棱瓶一重要實例為 1956 年西安西郊棗園唐咸通十二年張叔遵墓的出土品，此瓶較法門寺地宮出土八棱瓶（874）年代早三年，是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紀年例。法門寺地宮出土了十四件越窯青瓷，《衣物帳》中把其中的十三件稱為「秘色」，唯獨八棱瓶沒有被記錄。於是就有學者質疑法門寺出土的越窯八棱瓶是否屬於秘色瓷？宋伯胤就以張叔遵墓出土的八棱瓶為例，認為墓主張叔遵不見於史書，而在他的墓葬中出現與法門寺地宮出土品造型一致的八棱瓶，且傳世的八棱瓶還不止一件，說明這類器物並無特別可言，不屬於秘色瓷的範疇，器物的等級也不如衣物帳中所記錄的十三件秘色瓷高。[64] 張叔遵此人確實不見於史書，其墓葬也無正式的考古報告，但通過其他相關資料我們還是可以大致還原出張叔遵的經歷，這對我們理解八棱瓶在晚唐時期的器用有重要的意義。

張叔遵墓誌在 1990 年代初期正式公布，之後陸續有學者對墓誌進行錄文整理，也有一些初步的研究。[65] 據〈張叔遵墓誌〉，可知其為交趾人，生於元和四年（809），卒於咸通十二年。張叔遵供職於內侍省掖庭局，任宮教博士，是一名品職並不高的宦官，其曾祖父張尚進、其父張元振也都為宦官，他們之間沒有血緣，均為收養關係。這與唐代中期之後宦官專權的現象愈演愈烈、宦官世家大量出現，甚至形成宦官家族把持朝政的局面有關。[66] 相比諸如劉弘規、仇士良等可以把握軍政

64 宋伯胤，〈瓷秘色：唐文化的實物證言〉，收入韓金科主編，《98 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 603-612；後收入南京博物院編，《宋伯胤文集．陶瓷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 148-160。

65 〈張叔遵墓誌〉全名為〈大唐故朝請郎行內侍省掖庭局宮教博士上柱國清河張公墓誌銘並序〉，圖版見王仁波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陝西卷 2，頁 125；墓誌錄文見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1099-1100。相關研究見武伯綸，〈讀唐墓誌隨筆〉，收入氏著，《古城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頁 243-268；黃小芸，〈讀張叔遵墓誌〉，《文博》，2004 年 4 期，頁 74-76。

66 詳細的關於晚唐時期宦官世家的討論參見陳仲安，〈唐代後期的宦官世家〉，收入中國唐史學會編，《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 195-224；杜文玉，〈唐代宦官世家考述〉，《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7 卷 2 期（1998.6），頁 78-86。

大權的上層宦官集團，張叔遵家族要普通的多。著眼於晚唐時期的政治環境，陸揚在討論九世紀前期唐朝政治中宦官領袖的角色和作用時指出，九世紀前期逐漸形成了具有獨立性的官僚化宦官制度，很多宦官的身份由「家奴」向「國家大臣」的角色轉化，宦官在晚唐政局中的身份和作用需要重新被認識。[67]

我們再來關注張叔遵主要生活的九世紀中後期，唐會昌末年，宦官集團擁立宣宗，之後在大中末年又立懿宗，通過立君、弑君、廢君，宦官集團得以逐步擴大其在政治中的地位和勢力，宦官集團的地位首次得到外朝廷的承認，這是唐代宦官專權的分水嶺。[68] 張叔遵作為內廷宦官集團的一份子，其身份和地位不能只考慮官職的品級，也要結合這個時期的政治背景。

從墓葬的形制也能夠體現出張叔遵在當時的身份和地位。孫秉根在討論西安地區隋唐時期墓葬形制時介紹了張叔遵墓的結構，其為磚砌單室墓，墓室略呈方形，穹隆頂，豎斜墓道，一天井過洞，有磚、石墓門各一，甬道及墓室內有十二小龕，室西有磚棺床。[69] 齊東方根據唐代墓葬的等級和規制，認為張叔遵為正七品上階，墓室尺寸卻有約 4 平方公尺，且這類長斜坡墓道的方形磚室墓在晚唐時期很少見，其形制無異高於高宗、玄宗時期一至三品官吏的墓葬；在這一時期與張叔遵墓類似的形制還出現在閻知誠、高克從等三品不到的官員墓葬之中，而他們的共同點都是宦官，這種墓葬僭越的行為可能與中晚唐時期宦官橫行、權傾朝野的實際情況有關。[70]

所以根據晚唐時期的政治背景以及張叔遵墓的墓葬形制，我們再來反思張叔遵墓中出土的這件越窯青瓷八棱瓶，其所反映出的歷史訊息並不簡單，這恰恰表明了這一時期宦官的身份地位，也體現出八棱瓶所代表的高等級。

除了張叔遵墓出土的八棱瓶外，其他的幾個出土例也能夠反映出這類器物的使用等級。上述提到的無論是法門寺還是成都大聖慈寺，均為皇家寺院或與皇室有著密切關係，寺院的等級都很高。浙江慈溪上林湖後司嶴窯址是越窯八棱瓶的重要產

67 陸揚，〈9 世紀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領袖——以梁守謙和劉弘規為例〉，收入氏著，《清流文化與唐帝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頁 87-164。

68 凍國棟、黃樓，〈唐宦官集團與大中政局〉，《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58 卷 4 期（2005.7），頁 450-456。

69 孫秉根，〈西安地區隋唐墓的形制〉，收入《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紀念》（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頁 151-190。

70 參見齊東方，《隋唐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第三章隋唐陵墓，頁 82-83；另見齊東方，〈唐代的喪葬觀念習俗與禮儀制度〉，《考古學報》，2006 年 1 期，頁 59-81。

地，1977 年在上林湖吳家溪發現唐光啟三年（887）淩倜墓誌，墓誌中提到了墓葬的埋藏地點在「貢窯之北山」。[71] 而後司罍窯址就位於墓葬的南面，應該就是淩倜墓誌中所提到的「貢窯」，故後司罍窯址中所出土的包含八棱瓶在內的高品質秘色瓷也應為晚唐時期的「貢瓷」，代表著當時瓷業的最高水準。[72] 以上都可以體現出八棱瓶在晚唐時期的使用等級。

另外一點也值得思考和留意，《張叔遵墓誌》中有這樣一段記載：「以大中七年（853）十月廿三日蒙恩賜以綠綬，後轉授太（大）盈庫」。大盈庫為唐代皇帝的私庫，收藏各地進奉的物品，至遲出現在玄宗時期。由於大盈庫是皇帝的內庫，歸內侍省管理，所以目前的石刻史料和史籍中記載的掌管或者擔任過大盈庫相關職位的官員，經筆者統計全部為宦官。[73] 王壽南在分析唐代宦官權勢獲得原因的時候，就指出大盈庫始終被宦官所把控，他們掌控了唐代皇室的財政權，這是唐代宦官得勢的一個重要原因。[74] 再聯繫到張叔遵墓出土的八棱瓶，從同類秘色器物出現在唐代皇家寺院法門寺地宮來看，這類高等級的秘色瓷應為地方向中央進奉的瓷器，那麼曾作為大盈庫主管的張叔遵，也是能夠接觸到這類最高等級的瓷器的。至於張叔遵墓出土的八棱瓶是否即是直接從大盈庫或者與「貢瓷」相關的渠道獲得？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不過從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那件筆者推測原為八棱瓶的邢窯「盈」字款白瓷八棱罐來看，晚唐時期的宮廷內庫之中已經出現了八棱瓶的蹤跡。

（二）八棱瓶與佛教

1987 年法門寺地宮中室出土了越窯八棱瓶，之後成都江南館街唐大聖慈寺一帶出土了邢窯八棱瓶，這兩個出土的例子直接地反映了八棱瓶與佛教、佛寺有著密切的關係。

另外，仔細研讀出土有越窯八棱瓶的張叔遵墓的墓誌，還會有其他的發現。張叔遵墓誌中提到：「苦心於釋氏，虔敬歸依……三身智果，誓色身以成身；十號真如，修菩提以為號。六波羅密多，常念四諦，敬持十佛……留心釋氏，深契佛

71 阮平爾，〈唐光啟三年瓷質罐形墓誌及相關問題討論〉，《東南文化》，1989 年 2 期，頁 172-175。
7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岳明、鄭建明），〈浙江上林湖發現後司罍唐五代秘色瓷窯址〉，008 版。
73 尚民傑和程林泉在〈唐大盈庫與瓊林庫〉一文梳理有關大盈庫的文獻時，有提到六位與大盈庫有關的人，參見尚民杰、程林泉，〈唐大盈庫與瓊林庫〉，《考古與文物》，2004 年 6 期，頁 81-85；此外筆者在此基礎上補充二則材料，目前筆者統計在大盈庫任職的人有程希詮、仇士良、張叔遵、劉遵禮、似先義逸、田師巽、吳德鄘、郭佐思，一共八人，全部為宦官。
74 王壽南，《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71），頁 70-75。

理。」[75] 從墓誌文中不難看出張叔遵本人篤信佛教，嚴耀中進一步指出墓主人的信仰可能與密教有關。[76] 中古時期宦官與佛教的關係密切，由於彼時出現過信奉佛教產生靈驗而恢復真身的例子，宦官大多信奉佛教甚至推動了佛教的發展。[77] 我們現在無法瞭解張叔遵墓中出土的其他器物，器物之間組合關係的信息不明，但值得思考的是這件越窯青瓷八棱瓶是否與墓主人張叔遵的佛教信仰有關係？八棱瓶中具體有哪些佛教因素？

1. 闍伽瓶與香水瓶

自 1987 年法門寺地宮發現之後，有關地宮佈局、內涵的討論至今未斷，觀點大致可以分為兩派，一部分學者認為法門寺地宮與密教，特別是曼荼羅有關，而也有不少學者持保留意見。[78] 涉及到密教內涵儀軌的問題較為複雜，本文不做過多討論，而就八棱瓶而言，也有學者指出其與密教關係密切。王倉西認為地宮中室的八棱瓶與後室的四件鎏金銀瓶、一件玻璃瓶的擺放位置符合密教曼荼羅器物擺放的規律，但是未做出具體的論證，雖然後來不少學者指出此「曼荼羅」佈局說法的問題，不過也可作為一說。[79]

呂建福援引佛教文獻討論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密教法器，其中也有涉及到八棱瓶。[80] 首先法門寺地宮後室出土的四件鎏金銀瓶，位於地宮的四個角落，而且瓶子的底部分別墨書「東」、「南」、「西」、「北」，表明四件瓶子代表著方位，應與整個地宮的結構佈局以及內涵有關。《一切如來大秘密王未曾有最上微妙大曼荼羅經》載：「其外曼荼羅所有門及四角，當安置闍伽瓶。其瓶中當盛滿五寶五藥五穀等」。[81] 從地宮後室四件鎏金銀瓶的擺放位置來看，四件瓶子可能為「闍伽瓶」。若

75 楊璠，〈大唐故朝請郎行內侍省掖庭局宮教博士上柱國清河張公墓誌銘並序〉，收入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1100；另參見黃小芸，〈讀唐張叔遵墓誌〉，頁 74-76。

76 嚴耀中，〈試論唐五代的密教與社會生活〉，《佛學研究》，2004 年 1 期，頁 160-167。

77 劉淑芬，〈中古的宦官與佛教〉，收入氏著，《中古的佛教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46-71。

78 關於法門寺地宮與密教研究的學術史梳理和討論可以參見呂建福，〈關於法門寺地宮密教文物及其內涵研究中的若干問題〉，原載《法門寺博物館論叢》（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第 1 輯，頁 104-134，後收入李炳武總主編，《長安學叢書宗教卷》（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頁 260-287。持保留意見以羅炤先生為代表，參見羅炤，〈法門寺塔地宮及其藏品的幾個問題〉，《石窟寺研究》，2014 年 5 期，頁 121-153。

79 王倉西，〈法門寺地宮出土秘色瓷幾個問題的探討〉，頁 25。

80 呂建福，〈法門寺出土文物中的有關密教內容考釋〉，頁 156-157。

81（唐）天息災譯，《一切如來大秘密王未曾有最上微妙大曼荼羅經》，收入《大正新脩大正藏》（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第 18 冊，卷 1，頁 544 上。（以下皆簡稱《大正藏》）

越窯八棱瓶與地宮後室的四件鎏金銀瓶等共同組成了「曼荼羅」，那麼這裡八棱瓶也可能是作為閼伽瓶來使用的。

閼伽瓶是密教的法器，除了作為曼荼羅的組成部分外，另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盛裝淨水。「閼伽」為梵文音譯，意為「水」，特指奉佛之水。《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即應當稽首作禮奉閼伽水，此即香花之水」。[82] 所以閼伽瓶還具有「香水瓶」的功能。香水是佛教中非常重要的供養，聯繫到上文中提到的八棱瓶造型裝飾可能源自西方作為香水瓶的玻璃器，筆者推測法門寺地宮中的八棱瓶可能也是一種與奉佛密切相關的「香水瓶」。

2. 八棱瓶與佛教「五寶」、「七寶」觀念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直到 1990 年代法門寺發掘者在相關的研究文章中才披露地宮中室出土的八棱瓶「出土時內裝佛教五色寶珠 29 顆，瓶上有一顆大珠覆蓋」,[83] 而如此重要的信息在 1988 年法門寺地宮發掘簡報以及 2007 年《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中都沒有記錄，所以我們無法瞭解到當時八棱瓶出土時更加詳細信息，也不知八棱瓶內所裝具體為何物，不得不說是一憾事。

呂建福指出閼伽瓶和吉祥瓶有時互用，吉祥瓶也稱賢瓶、五寶瓶（七寶瓶）。[84]《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記載:「吉祥瓶法，當用金銀等寶，乃至無者應以瓷或淨瓦為之，極令圓滿端正，又不洩露……淨水盛其中，內五寶、五藥、五穀……於瓶中口插寶花，以彩繒纏頸並系花鬘、塗香」。[85] 這條史料明確指出了瓷器可以作為「吉祥瓶」。吉祥瓶中盛裝淨水的同時還可以內裝「五寶」。佛教中的「五寶」包含的內容很多，主要為金、銀、珍珠、水晶、瑪瑙、琉璃等貴金屬和寶石，聯繫到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八棱瓶中內裝 29 顆「五色寶珠」，這件八棱瓶可能為佛教中的吉祥瓶（五寶瓶、七寶瓶）。

另一個方面也可以輔證八棱瓶為五寶瓶（七寶瓶）。法門寺地宮中室出土的八棱瓶編號 FD4-002-1，查閱地宮中室（FD4）的遺物分佈圖以及結合考古報告中的《唐代法門寺地宮出土遺物一覽表》，發現存在編號 FD4-002-2 ～ 3 的銀蒂水晶花蕾 2 枚，長 4.3 公分，共重 10.2 公克。從編號上來看這兩枚銀蒂水晶花蕾是放置於八

82（唐）一行，《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收入《大正藏》，第 39 冊，卷 11，頁 699 上。
83 王倉西，〈法門寺地宮出土秘色瓷幾個問題的探討〉，頁 25。
84 呂建福，〈法門寺出土文物中的有關密教內容考釋〉，頁 156-157。
85 轉引自呂建福，〈法門寺出土文物中的有關密教內容考釋〉，頁 156，出自《大正藏》，第 39 冊，頁 659 中。

棱瓶內的。[86]《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中提到：「（吉祥瓶）於瓶口插寶花」。《過去現在因果經》中載「於是地神，持七寶瓶，滿中蓮花，從地踴出」。[87] 筆者認為八棱瓶中出土的兩件銀蒂水晶花蕾可能也與此有關。

佛教中有供養寶物的傳統，中古時期佛教信徒修建佛塔來供奉和瘞藏佛舍利，用來供養舍利之物很重要的一部分即為「七寶」。「七寶」很多情況下都是與舍利一起放置在舍利函內，這一點于薇的研究中有較為詳細的論述。[88] 同時也會出現像法門寺地宮這樣用瓶子來盛裝「七寶」的行為，而作為「七寶」容器的瓶也就具有更強烈的宗教意涵。

正如中古時期佛塔地宮中盛裝聖物舍利的容器往往專門選擇使用珍貴舶來品的玻璃小瓶，以顯示對舍利的尊重，「七寶瓶」的選擇同樣受到重視。《毘尼母經》中有這樣一段記載：「佛當欲剃髮時，告語諸人：『此髮不可故衣故器盛之，當用新物。』當剃髮時，瞿波羅王子來到佛所，從世尊乞髮持還國供養，佛即許之。王子即復諮啟世尊：『此髮應以何等器盛之供養？』佛言：『應用七寶作器盛之供養。』即如佛教造七寶瓶而用盛之。」[89] 佛的頭髮也是一種聖物舍利，佛祖專門要求信徒要把「佛發」裝在七寶瓶內，可見佛教供養中七寶瓶的選擇是很重要的。那麼，選擇珍貴的越窯秘色瓷八棱瓶來作為「七寶瓶」，也在情理之中了。

除了法門寺地宮的越窯八棱瓶外，在隋代大興城清禪寺塔塔基出土了兩件瓷瓶，[90] 其中一件瓷瓶內盛放著水晶、瑪瑙、玉石、琉璃等，口沿還放置一隻琉璃瓶。 這裡的瓷瓶筆者認為也應是「七寶瓶」。還需要指出的是，上文中有指出瓷器八棱瓶的造型可能來自西亞地區的玻璃器，而在中古時期盛放舍利的「舍利瓶」多為玻璃製品，那麼作為模仿西亞舶來品的越窯八棱瓶是否與舍利容器之間有一定關係？或許也值得思考。

---

86 韓生編著的《法門寺文物圖飾》一書中公佈了一批法門寺地宮出土文物的彩色圖版，其中第 272 頁下圖為一張俯拍的越窯青瓷八棱瓶的照片，八棱瓶一旁有 10 顆大小不一的寶珠，另有兩枚花蕾形飾物，即前述的編號為 FD4-002-2 ～ 3 的銀蒂水晶花蕾。該圖的圖註為「八棱淨水瓶內盛放的各色珠子」，作者韓生供職於法門寺博物館，其所言的這批「各色珠子」應為前文中論及的八棱瓶中 29 顆五色寶珠中的一部分。這條資料承蒙淺沼桂子女士教示，謹致謝意。參見韓生編著，《法門寺文物圖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 272。

87（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收入《大正藏》，第 3 冊，卷 3，頁 640 中。

88 于薇，〈聖物製造：中古時期佛教舍利供養研究〉（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博士論文，2016）。

89（唐）佚名，《毘尼母經》，收入《大正藏》，第 24 冊，卷 3，頁 816 中。

90 鄭洪春，〈西安東郊隋舍利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8 年 1 期，頁 61-65。

3. 淨瓶

「澡灌」在漢文佛典中又稱為「軍持」、「淨瓶」，是佛教中潔淨盥洗用具，後來在中國逐漸轉變為觀音菩薩的象徵。[91] 余欣指出澡灌用具本為印度地區日常生活中的盥洗具，後因導入佛教潔淨觀念，澡灌被賦予了更豐富的宗教色彩。[92]

《大唐西域記》中講到印度風俗時提到：「凡有饌食，必先盥洗……澡漱未終，勿相執觸。每有溲溺，必事澡灌。身塗諸香，所謂旃檀、郁金也。君王將浴，鼓奏弦歌。祭祀拜祠，沐浴盥洗。」[93] 這其中的很多部分也都被借鑒到佛教之中，佛教對於「潔淨」的觀念十分重視。《佛說不空罥索陀羅尼儀軌經》：「是法如持七寶瓶。置香水於中。復加持置於壇內。而用灌頂。」[94] 又《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教跡義記》：「猶如世間輪王太子欲紹王位以承國祚。用七寶瓶盛四大海水。澆頭灌頂方承王位」。[95] 這裡可以看到「七寶瓶」也可以作為一種盥洗、潔淨用具來使用。

還有一個細節值得留意。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有描寫印度僧人如何使用水器：「其作瓶法，蓋需連口……斯之二穴恐蟲塵入，或可著蓋，或以竹木，或將布葉而裹塞之，彼有梵僧取而製造，若取水時，必須洗內令塵垢盡方始納新。」這裡可以發現佛教中對於澡灌用的水要求很高，必須極度潔淨，所以常在「淨瓶」口部蓋一個物品防止蟲子、灰塵進入。而法門寺地宮出土的八棱瓶的口部恰好就有一顆大珠覆蓋，前述隋代清禪寺塔基出土的瓷瓶口部也放置有一琉璃瓶覆蓋，筆者認為這為了防止異物進入污染瓶內淨水或「七寶」，從這一點表明八棱瓶與七寶瓶、淨瓶之間的密切關聯。

從與佛教相關聯的角度，八棱瓶可能具有香水瓶、七寶瓶和盥洗用具（淨瓶）三種功能，三個方面看似並不相關，但在佛教儀軌習俗上，這三個功能又是截然分不開的，也都體現出八棱瓶的佛教內涵。

（三）八棱瓶的世俗化功能

上文中討論了八棱瓶的造型可能來自西亞的玻璃器，而類似造型的玻璃器由水

91 尚永琪，〈漢唐佛教造像與壁畫中的淨瓶研究——以石窟寺為中心的一個考察〉，收入光泉主編，《吳越佛教》（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7 卷，頁 388-401。
92 余欣，《中古異相：寫本時代的學術、信仰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 295-302。
93（唐）玄奘撰，章巽點校，《大唐西域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卷 2，頁 35。
94（唐）阿目佉譯，《佛說不空罥索陀羅尼儀軌經》，收入《大正藏》，第 20 冊，卷 2，頁 440 中。
95（唐）法崇述，《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教跡義記》，收入《大正藏》，第 39 冊，卷 2，頁 1030 上。

常雄和揚之水等都認為是香水瓶或者薔薇水瓶，由此筆者認為瓷器八棱瓶也應有類似的盛裝香水的功能，這一點從佛教七寶瓶與香水供養方面也能得到支持。

佛教中的八棱瓶可能作為一種盥洗用具，這也影響到世俗生活之中。在中古時期無論是皇室貴族，或是文人士大夫，亦或是平民百姓，很多都信奉佛教，而佛教中的一些儀式習慣也會進入到世俗社會的日常生活中。正如與佛教儀軌關係密切的香水，除了塗抹身體、給衣物增加香氣以外，還被用來用作盥洗用。《續高僧傳》記載：「（大業）三年正月九日，弟子智翔、智傅侍疾，忽有異香滿室，赤光照牖，即夜香水盥漱，遺疏周悉，端坐正念，以至無常，時年六十有七」，[96] 由此可見中古時期僧侶之中有用香水盥洗的行為。香水盥洗也出現在晚唐時期文人士大夫之中，柳宗元每當受到韓愈來信時，總是要「先以『薔薇露』盥手，熏玉蕤香，後發讀」，[97] 以顯示對韓愈來信的重視。佛教密宗在中晚唐士大夫中十分流行，韓愈和柳宗元二人同樣與佛教關係密切。[98] 以香水淨手的行為很可能也是來自佛教，成為當時的一種「風尚」。不僅如此香水盥洗的風俗也出現在東南亞地區，《北史》卷九十五「赤土國」條載：「（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並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二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99] 從這幾條文獻來看，使用香水盥洗流行和使用的階層都十分廣泛。應注意的是，用香水盥洗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潔淨」，更多的還是一種禮儀和禮節，這一點從「柳宗元香手讀信」和赤土國迎使香水洗手行為都可以得到佐證。

2017 年上海龍美術館舉辦「敏行與迪哲：宋元書畫私藏集萃」展覽，其中展出了一幅傳唐代張萱的〈唐后行從圖〉。[100]（圖 24）這幅畫原為張蔥玉韞輝齋舊藏，在二十世紀初期較為知名，現在還可以見到一些摹本，此畫後來下落不明，近年出現於拍場，我們可以再見到這幅畫的原作。[101] 關於這幅畫作的年代尚有爭議，張珩、徐邦達等認其為唐畫，吳湖帆、傅熹年持「宋畫說」，沈從文從畫中人物服飾比較認為此畫最早也不過宋代。筆者並無能力討論此畫的確切年代和作者，不過畫中人物所持的一些器物如唾壺、捧盒等，造型可追溯到唐代。無論畫作的年代如何，此

96（唐）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卷 9，頁 324。
97 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吳玉貴譯，《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頁 430-431。
98 黃陽興，《咒語．圖像．法術——密教與中晚唐文學研究》（深圳：海天出版社，2015），頁 30-162；孫昌武，〈柳宗元與佛教〉，《文學遺產》，2015 年 3 期，頁 73-81。
99（唐）李延壽撰，《北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頁 3161。
100 龍美術館編，《敏行與迪哲：宋元書畫私藏集萃》（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6），頁 48。
101 朱紹良，〈唐后行從圖考析〉，《收藏家》，2017 年 1 期，頁 18-28。

畫至少還保留著一些早期的信息，我們從中可以了解一些中古時期宮廷、貴族生活的場景。有趣的是我們在〈唐后行從圖〉畫面的主要人群的右側可以看到一位侍從手捧一盤，盤上立有一瓶，瓶為長頸，腹部方折，瓶的造型與八棱瓶十分接近（圖25），而旁邊其他的侍從手捧渣斗、唾壺、盆等的器物，從整體的器物組合來看，這裡出現的八棱瓶應是作為一種盥洗用具，可能是用來洗手或者給身體添香。

河北曲陽五代王處直墓（924）中保存有很精美的壁畫，[102] 其中在西耳室南壁壁畫上有一位仕女手捧一個鼓腹的長頸瓶（圖 26）。如果我們把西耳室東壁和西壁的壁畫與南壁連在一起看，還原出一個整體的畫面（圖 27），我們可以發現仕女手捧長頸瓶面向左，左邊是一個大桌子，桌子上是一個花口盆，應是盛裝液體的；而在仕女右面的東壁上畫了一個梳妝檯，上面擺滿了鏡子、首飾等，在兩個盒子的中間我們又見到了仕女所捧的長頸瓶的形象，應讓是盛裝某種化妝品。聯繫到這類長頸瓶或為香水瓶，如此來看王處直墓西耳室上仕女所捧的長頸瓶可能也是一種用來增香、盥洗的用具。有趣的是王處直墓壁畫中仕女所捧鼓腹長頸瓶，其口部有還一蓋，蓋與瓶口均置有一小環可供繩鏈連接，這個細節以及瓶子的造型與朝鮮半島十二、十三世紀的被稱為「鶴首瓶」的鼓腹長頸瓶非常相似（圖 28），兩者之間或存在某種關聯，而後者的造型、裝飾或又是受到了越窯八棱瓶的影響。[103]

王處直墓中除了壁畫外，還有十分精彩的高浮雕石刻，其中有一塊尺寸很大的石雕描繪的是仕女奉侍的場景，在畫面中央也出現了一位仕女手捧鼓腹長頸瓶（圖 29），身旁其他的仕女有捧盒子、團扇、拂塵、執壺、酒杯等，場面與〈唐后行從圖〉類似，這裡長頸瓶的功能也應該與添香禮儀有關。

仕女手捧長頸瓶的形象在十世紀還有其他的例證。陝西彬縣五代朔方節度使馮暉墓（958）墓室東、西、北壁兩側各繪有一位仕女，其中墓室北壁左側仕女頭部不存，但可以看到手持一鼓腹直徑的器物（圖 30），雖然器物頸部有殘缺，發掘者稱為「淨瓶」，從器物表面的裝飾來看，與王處直墓墓室東壁梳粧檯上的長頸瓶大致一樣，筆者認為馮暉墓北壁左側仕女手捧的可能也為鼓腹長頸瓶。[104] 北壁右側的仕女上半部分也殘缺，手持物為拂塵，中古時期墓室壁畫中類似的手持拂塵的人物形象有不少，而拂塵也有禮儀和潔淨用具的功能，[105] 這也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

102 河北文物研究所等，《五代王處直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103 邱寧斌，〈翡色天青：高麗青瓷八棱瓶〉，《美成在久》，2019 年 3 期，頁 56-63。
104 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五代馮暉墓》（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
105 王昱東，〈唐墓壁畫中所見拂塵〉，《文博》，2000 年 4 期，頁 48-53。

這類長頸瓶（八棱瓶）的功用。另外在山西太原北漢天會五年（961）劉廷斌墓也有類似的圖像，在墓室東北柱間壁兩側繪有兩位男侍從，一位執插手禮，另一位手持一長頸瓶（圖 31）。[106]「插手（叉手）禮」是中古時期的佛教和世俗社會中常見的一種禮儀形式，流行範圍很廣。[107] 墓室中執插手禮的侍從與持長頸瓶的侍從相對應，表明了手持長頸瓶的行為可能蘊含著和禮儀相關的某些因素，進一步證實了前述用八棱瓶淨手添香也是一種禮儀性行為。

從圖像材料來看，幾個紀年墓葬都集中在十世紀早中期，表明這類器物應該在這個時期最為流行，也印證了前述瓷質長頸瓶、八棱瓶生產流行的時代在九世紀後半到十世紀。

五、餘論

從現存的十餘件八棱瓶或鼓腹長頸瓶的整器或標本來看，其生產的時代主要集中在九世紀後半到十世紀，也就是晚唐五代時期。其產地除了通常見到的越窯以外，在北方的邢窯也有生產。其共性在於鼓腹、長頸，大多裝飾有八條棱線。此類裝飾很可能來源於西亞的玻璃器，作香水瓶所用。出土八棱瓶的法門寺地宮和張叔遵墓都與佛教密宗有著密切的聯繫，表明了八棱瓶與佛教的關聯。從法門寺地宮的考古材料來看，可知八棱瓶有香水瓶、七寶瓶、盥洗用具三種功能。而佛教中用八棱瓶和香水進行清潔盥洗的習俗也進入到世俗社會中，從〈唐后行從圖〉和五代王處直墓壁畫中可窺一斑。

要指出的是，王處直墓、馮暉墓墓室壁畫中長頸瓶都帶有紋飾，器物材質不明，較大可能是金屬器。尤其是王處直墓中長頸瓶腹身裝飾多道弦紋，類似的表現多見於響銅器等金屬器物上。就筆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並未發現與瓷器造型一致的金屬器長頸瓶（八棱瓶），一個相關線索是 1966 年內蒙古赤峰市克什克旗遼墓出土了一件「長柄銀壺」（圖 32），[108] 這件銀壺鼓腹長頸，上半部分與瓷器中的長頸瓶相似，但是圈足過高，和瓷器有較大差異。晚唐五代金屬器發現的數量不多，隨著

106 徐光驥主編，《中國出土墓室壁畫全集　2　山西》（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圖 104，頁 114。
107 黃建波，〈「叉手」禮圖像考〉，《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2014 年 4 期，頁 5-13。
108 項春松，〈克什克騰旗二八地一、二號遼墓〉，《內蒙古文物考古》，1984 年，頁 80-90。

考古工作的深入，可能有與瓷器器形相似的金屬器被發現。[109]

另外，類似八棱瓶造型的長頸瓶還出現在之後十二、十三世紀的汝窯和高麗青瓷中（圖 28），三者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的聯繫？近年來新公佈的一些材料也給我們提供了新的視角。2008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寫出版了《寶豐清涼寺汝窯》的考古發掘報告，系統整理了河南寶豐清涼寺汝窯窯址 1999 至 2002 年間的四次考古發掘的資料。[110] 在汝窯成熟期的遺物中，就有發掘者定位北宋晚期的汝窯八棱瓶，如標本 C2:947，復原高 20 公分。（圖 33）另外清涼寺汝窯 2011 年第九次發掘中還出土了一批汝窯的素燒器，其中就有一件八棱瓶頸部的標本，造型和細節與越窯八棱瓶驚人的相似。（圖 34）

汝窯、高麗青瓷的八棱瓶與越窯、邢窯的有何關係？時間與空間上都存在著諸多有趣的關聯，有待考古發掘的新發現和研究的進一步深入。[111]

〔後記〕本文初稿作於 2017 年，劉朝暉、謝明良兩位老師作為最早的讀者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之後文章的部分章節內容報告於幾次學術研討會和讀書會，得到了李梅田、陳悅新、八木春生、陳潔等諸位師友的提示和啟發；鄭建明、謝純龍提供了在上林湖後司嶴越窯窯址考古實習機會，本人得以上手觀摩重要的八棱瓶標本；本文兩位匿名評審給與了非常有價值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感謝。

109 克什克騰旗遼墓出土的這件長頸銀壺在《內蒙古珍寶　金銀器》（高延青主編，《內蒙古珍寶　金銀器》(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7)，頁 162）一書中被認為是「伊斯蘭式淨水瓶」，筆者比較認同。這件器物最初最初發掘者就認為器形較為怪異，可能存在後來在遼地的再改裝。還有一點值得留意的是，馮暉墓中長頸瓶的形象與上述提到的韓國三星美術館收藏的十三世紀高麗青瓷長頸瓶的裝飾圖案驚人的相似，瓶子的底部都有裝飾蓮瓣，腹身有花卉，頸部有類似的雲紋，但兩者時代相差大約三個世紀，不免讓人產生疑問。或許高麗青瓷長頸瓶的造型和紋飾早在十世紀就有出現？因為越窯細線刻劃裝飾在十世紀中期就已經很流行，所以不排除越窯在十世紀也有生產類似造型和刻劃紋飾的長頸瓶。

11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寶豐清涼寺汝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111 關於越窯八棱瓶與汝窯、高麗青瓷類似器型的比較研究，可參見森達也，〈汝窯與南宋官窯——燒造技術與器種的比較〉，收入故宮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編，《故宮博物院八十五華誕宋代官窯與官窯制度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頁 135-166；邱寧斌，〈翡色天青：高麗青瓷八棱瓶〉，頁 56-63；邱寧斌，〈汝窯八棱瓶及相關問題研究〉，《美成在久》，2020 年 6 期，頁 66-73。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卷 3，收入《大正新脩大正藏》，第 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

（唐）一行，《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收入《大正新脩大正藏》，第 39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

（唐）天息災譯，《一切如來大秘密王未曾有最上微妙大曼荼羅經》，收入《大正新脩大正藏》，第 18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

（唐）玄奘撰，章巽點校，《大唐西域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唐）佚名，《毘尼母經》，收入《大正新脩大正藏》，第 24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

（唐）李延壽撰，《北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

（唐）法崇述，《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教跡義記》，收入《大正新脩大正藏》，第 39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

（唐）阿目佉譯，《佛說不空罥索陀羅尼儀軌經》，收入《大正新脩大正藏》，第 2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

（唐）楊璠，〈大唐故朝請郎行內侍省掖庭局宮教博士上柱國清河張公墓誌銘並序〉，收入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1100。

（唐）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

（宋）黃休複撰，何韞若、林孔翼校，《益州名畫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近代論著

于薇，〈聖物製造：中古時期佛教舍利供養研究〉，上海：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博士論文，2016 年。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晉陽古城一號建築基址》，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隊（安家瑤），〈唐長安西明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0 年 1 期，頁 45-55。

內蒙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館編，《遼陳國公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支廣正，〈唐代邢窯貢瓷「盈」字款研究〉，《文物春秋》，2006 年 5 期，頁 39-51。

王仁波主編，《隋唐五代墓誌彙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王光堯，〈關於越窯瓷器所見「官樣」銘的思考——兼釋「官」「新官」款的含義〉，《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第五輯，2001 年 1 月，頁 174-179；後收入氏著，《中國古代官窯制度》，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頁 40-49。

王長啟，〈西安市出土「翰林」「盈」字款邢窯白瓷罐〉，《文物》，2002 年 4 期，頁 83-84。

王昱東，〈唐墓壁畫中所見拂塵〉，《文博》，2000 年 4 期，頁 48-53。

王倉西，〈法門寺地宮出土秘色瓷幾個問題的探討〉，《文博》，1995 年 6 期，頁 18-26。

王泰初，〈瓷片刻款揭秘唐宮廷用瓷〉，《收藏》，2011 年 12 期，頁 62-67。

王莉英、馮小琦、陳潤民，〈從故宮博物院藏品談早期白瓷〉，收入上海博物館編，《中國古代白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博物館，2005，頁 373-381。

王莉英、穆青，《定窯瓷鑒定與鑒賞》，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03。

王會民，〈邢窯三次發掘與收穫〉，收入中國古陶瓷學會編，《越窯青瓷與邢窯白瓷研究》，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頁 153-163。

王會民、樊書海，〈邢窯遺址考古發掘有重要發現〉，《中國文物報》，2003 年 10 月 29 日，2 版。

王壽南，《唐代宦官權勢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71。

王衛明，《大聖慈寺畫史叢考——唐、五代、宋時期西蜀佛教美術發展探源》，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四川省文史館，《成都城坊古跡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由水常雄，賀晶、黃海雲譯，《香水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黃曉楓等），〈成都市江南館街唐宋遺址發掘簡報〉，收入《成都考古發現（1999）》，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 260-277。

朱伯謙，〈古瓷中的瑰寶——秘色瓷〉，收入張豈之、韓金科主編，《首屆國際法門寺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頁 250-253。

朱紹良，〈唐後行從圖考析〉，《收藏家》，2017 年 1 期，頁 18-28。

余欣，《中古異相：寫本時代的學術、信仰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呂成龍，〈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三件越窯秘色瓷瓶〉，收入汪慶正主編，《越窯．秘色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 62-63。

呂建福，〈法門寺出土文物中的有關密教內容考釋〉，收入張豈之、韓金科主編，《首屆國際法門寺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頁 151-163。

呂建福，〈關於法門寺地宮密教文物及其內涵研究中的若干問題〉，原載《法門寺博物館論叢》（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第 1 輯，頁 104-134；後收入李炳武總主編，《長安學叢書 宗教卷》，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頁 260-287。

宋伯胤，〈「秘色越器」辯證〉，收入張豈之、韓金科主編，《首屆國際法門寺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頁 241-249。

宋伯胤，〈瓷秘色：唐文化的實物證言〉，收入韓金科主編，《98 法門寺唐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 603-612；後收入南京博物院編，《宋伯胤文集．陶瓷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 148-160。

李輝柄，〈談法門寺出土的越窯青瓷〉，《文物》，1988 年 10 期，頁 38-39。

杜文玉，〈唐代宦官世家考述〉，《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7 卷 2 期，1998 年 6 月，頁 78-86。

汪慶正主編，《越窯．秘色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沈岳明等，〈2015 慈溪上林湖荷花芯越窯遺址考古發掘概況〉，《陶瓷考古通訊》，2015 年 2 期，頁 21-23。

阮平爾，〈唐光啟三年瓷質罐形墓誌及相關問題討論〉，《東南文化》，1989 年 2 期，頁 172-175。

周世榮，《湖湘陶瓷》，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8。

周紹良、趙超主編，《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 年 8 期，頁 39-51。

尚民杰、程林泉，〈唐大盈庫與瓊林庫〉，《考古與文物》，2004 年 6 期，頁 81-85。

尚永琪，〈漢唐佛教造像與壁畫中的淨瓶研究——以石窟寺為中心的一個考察〉，收入光泉主編，《吳越佛教》，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卷 7，頁 388-401。

易立，〈關於四川三臺出土「官」款白瓷的幾個問題〉，《四川文物》，2009 年 1 期，頁 60-64。

林士民，〈明（越）州貢窯之研究〉，收入李家治、陳顯球主編，《92 古陶瓷科學技術國際討論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陶瓷科學技術研究會，1992，頁 477-482。

林士民，〈浙江寧波考古述略〉，《浙東文化》，1994 年第 1-2 期合刊，頁 63-81；後收入氏著，《再現昔日的文明——東方大港寧波考古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頁 59-69。

林士民，〈談越窯青瓷中的秘色瓷〉，《文博》，1995 年 6 期，頁 57-62。

林容伊，〈唐宋陶瓷與西方玻璃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武伯綸，〈讀唐墓誌隨筆〉，收入氏著，《古城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頁 243-268。

河北文物研究所等，《五代王處直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王會民等），〈邢窯遺址調查、試掘報告〉，《考古學集刊》，2004 年 14 期，頁 191-23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寶豐清涼寺汝窯》，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邱寧斌，〈割據時代下的瓷器與瓷業——以晚唐五代官方製瓷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碩士論文，2018。

邱寧斌，〈翡色天青：高麗青瓷八棱瓶〉，《美成在久》，2019 年 3 期，頁 56-63。

邱寧斌，〈汝窯八棱瓶及相關問題研究〉，《美成在久》，2020 年 6 期，頁 66-73。

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五代馮暉墓》，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中國古代窯址標本：河北》，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凍國棟、黃樓，〈唐宦官集團與大中政局〉，《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58 卷 4 期，2005 年 7 月，頁 450-456。

孫昌武，〈柳宗元與佛教〉，《文學遺產》，2015 年 3 期，頁 73-81。

孫秉根，〈西安地區隋唐墓的形制〉，收入《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紀念》，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頁 151-190。

徐光驥主編，《中國出土墓室壁畫全集　2　山西》，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沈岳明、鄭建明），〈浙江上林湖發現後司嶴唐五代秘色瓷窯址〉，《中國文物報》，2017 年 1 月 27 日，008 版。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沈岳明、鄭建明主編），《秘色越器——上林湖後司嶴窯址出土唐五代秘色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晚唐錢寬夫婦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浙江省博物館、定州市博物館編，《心放俗外——定州靜志、靜眾佛塔地宮文物》，北京：中國書店，2014。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段紹嘉），〈介紹幾件陝西出土的唐代青瓷器〉，《文物》，1960 年 4 期，頁 48。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高延青主編，《內蒙古珍寶　金銀器》，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7。

張海霞，〈故宮博物院文物編號整理及應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4。

張豈之、韓金科主編，《首屆國際法門寺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陳仲安，〈唐代後期的宦官世家〉，收入中國唐史學會編，《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 195-224。

陳萬里，〈最近調查古代窯址所見〉，《文物參考資料》，1955 年 8 期，頁 111-113。

陳萬里，《陳萬里陶瓷考古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7。

陸明華，〈邢窯「盈」字及定窯「易定」考〉，《上海博物館集刊》，1987 年 4 期，頁 257-262。

陸明華，〈唐代秘色瓷有關問題探討〉，《文博》，1995 年 6 期，頁 77-85。

陸明華，〈秘色瓷八棱瓶再研究〉，收入汪慶正主編，《越窯．秘色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 64-65。

陸揚，〈9 世紀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領袖——以梁守謙和劉弘規為例〉，收入氏著，《清流文化與唐帝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頁 87-164。

彭金章，〈莫高窟第 14 窟十一面觀音經變〉，《敦煌研究》，1994 年 2 期，頁 89-97。

彭善國，〈試析「盈」字款瓷器〉，《考古與文物》，2007 年 1 期，頁 90-94。

揚之水，〈琉璃瓶與薔薇水〉，收入氏著，《香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 165-179。

敦煌研究院（段文傑主編，彭金章分冊主編），《敦煌石窟全集　密教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

景竹友，〈三臺出土的白定「官」字款瓷器〉，《四川文物》，1996 年 1 期，頁 57-58。

朝陽地區博物館（朱子方、徐基），〈遼寧朝陽姑營子遼耿氏墓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1983 年 3 期，頁 168-195。

森達也，〈汝窯與南宋官窯——燒造技術與器種的比較〉，收入故宮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編，《故宮博物院八十五華誕宋代官窯與官窯制度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頁 135-166。

越窯博物館，《南青北白——越窯與邢窯瓷特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項春松，〈克什克騰旗二八地一、二號遼墓〉，《內蒙古文物考古》，1984 年，頁 80-90。

馮先銘，〈法門寺出土的秘色瓷〉，《文物》，1988 年 10 期，頁 36-37。

黃小芸，〈讀張叔遵墓誌〉，《文博》，2004 年 4 期，頁 74-76。

黃建波，〈「叉手」禮圖像考〉，《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2014 年 4 期，頁 5-13。

黃陽興，《咒語．圖像．法術——密教與中晚唐文學研究》，深圳：海天出版社，2015。

黃衛文，〈故宮博物院藏唐代白瓷研究〉，收入中國古陶瓷學會編，《越窯青瓷與邢窯白瓷研究》，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頁 307-322。

慈溪市博物館（謝純龍主編），《上林湖越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趙慶剛、張志忠主編，《千年邢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齊東方，《隋唐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齊東方，〈唐代的喪葬觀念習俗與禮儀制度〉，《考古學報》，2006 年 1 期，頁 59-81。

劉淑芬，《中古的佛教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禚振西、韓偉、韓金科，〈法門寺出土唐代秘色瓷初探〉，《文博》，1995 年 6 期，頁 27-32、35。

鄭洪春，〈西安東郊隋舍利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8 年 1 期，頁 61-65。

餘姚市文物保護管理所、餘姚市歷史文化名城明賢研究會（葉樹望主編），《餘姚文物圖錄》，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2。

龍美術館編，《敏行與迪哲：宋元書畫私藏集萃》，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6。

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吳玉貴譯，《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舶來品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謝明良，〈有關「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含義的幾個問題〉，《故宮學術季刊》，5 卷 2 期，1987 年冬季，頁 1-38；後增補收入氏著，《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出版社，2007，頁 79-118。

謝明良，〈記「黑石號」（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國陶瓷器〉，《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13 期，2002 年 9 月，頁 1-60+277；後收入氏著，《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出版社，2005，頁 81-134。

謝明良，〈臺灣故宮博物院藏兩件汝窯紙槌瓶及相關問題〉，收入氏著，《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 3-16。

韓生編著，《法門寺文物圖飾》，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羅炤，〈法門寺塔地宮及其藏品的幾個問題〉，《石窟寺研究》，2014 年 5 期，頁 121-153。

嚴耀中，〈試論唐五代的密教與社會生活〉，《佛學研究》，2004 年 1 期，頁 160-167。

鐘治，〈三臺館藏瓷器擷英〉，《故宮文物月刊》，257 期，2004 年 8 月，頁 67-68。

ジャック・ジエス編輯，ジャン・フランソワ・ジャリージュ、秋山光和監修，《西域美術：ギメ美術館ペリオ・コレクション》，東京：講談社，1994。

今井敦，《青磁》，收入平凡社編，《中國の陶磁》，第 4 冊，東京：平凡社，1997。

水野敬三郎、紺野敏文等編著，《密教寺院と仏像：平安の建築・彫刻 I》，收入《日本美術全集》，東京：講談社，1992，第 5 卷。

出光美術館，《地下宮殿の遺寶——中國河北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展》，東京：出光美術館，1997。

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岡山市立オリエント美術館編，《古代ガラスの技と美：現代作家による挑戦》，東京：山川出版社，2001。

由水常雄編，《世界ガラス美術全集　1　古代到中世》，東京：求龍堂，1992。

長谷部楽爾，〈十世紀の中國陶磁〉，《東京国立博物館紀要》，第 3 号，1968 年 3 月，頁 177-242。

森達也，〈ペルシアと中國——陶磁器、金屬器、ガラスに見る東西交流〉，《陶說》，卷 650，2007 年 5 月，頁 20-26。

Carboni, Stefano. *Glass from Islamic Lands*.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2001.

Fleming, Stuart J. Roman *Glass: Reflections on Cultural Chang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1999.

Fukai, Shinji. *Persian Glass*. Translated by Edna B. Crawford. New York, Tokyo, Kyoto: Weatherhill/Tankosha, 1977.

Sotheby's, *Fine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 London: Sotheby's London, June.1995.

Sotheby's, *Fine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 New York: Sotheby's New York, September.2006.

Sotheby's, *Chinese Art,* Hong Kong : Sotheby's Hong Kong, November.2014.

圖版出處

圖 1-1 晚唐，越窯八棱長頸瓶，殘高 15.2 公分，浙江慈溪上林湖後司嶴窯址出土。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沈岳明、鄭建明主編），《秘色越器——上林湖後司嶴窯址出土唐五代秘色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頁 35。

圖 1-2 晚唐，越窯八棱長頸瓶（黏連匣缽），通高 20.2 公分，浙江慈溪上林湖後司嶴窯址出土。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沈岳明、鄭建明主編），《秘色越器——上林湖後司嶴窯址出土唐五代秘色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頁 35，頁 36。

圖 1-3 五代，越窯八棱長頸瓶（黏連匣缽），殘高 6.4 公分，浙江慈溪上林湖後司嶴窯址出土。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沈岳明、鄭建明主編），《秘色越器——上林湖後司嶴窯址出土唐五代秘色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頁 35，頁 102。

圖 2　晚唐，越窯八棱瓶腹部殘片，1954 年陳萬里浙江上林湖採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汪慶正主編，《越窯．秘色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附圖 60。

圖 3　晚唐，越窯八棱長頸瓶，高 22.3 公分，1956 年陝西西安西郊棗園唐咸通十二年（871）張叔遵墓出土，陝西歷史博物館藏。圖片取自今井敦，《青磁》，收入平凡社編，《中國の陶磁》，第 4 冊，東京：平凡社，1997，圖 27。

圖 4　晚唐，越窯八棱長頸瓶，殘高 19.5 公分，1978 年餘姚縣文管會上林湖採集，餘姚市博物館藏。圖片取自余姚市文物保護管理所、余姚市歷史文化名城明賢研究會（葉樹望主編），《余姚文物圖錄》，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2，頁 70。

圖 5　晚唐，上林湖越窯窯址採集、發掘青瓷標本。圖片取自汪慶正主編《越窯．秘色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圖 63。

圖 6　晚唐，越窯八棱長頸瓶，高 21.5 公分，1987 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中室出土（874），法門寺博物館藏。圖片取自汪慶正主編《越窯．秘色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圖 63。

圖 7　晚唐，越窯鼓腹長頸瓶，殘高 10.4 公分，浙江慈溪上林湖後司嶴窯址出土。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沈岳明、鄭建明主編），《秘色越器——上林湖後司嶴窯址出土唐五代秘色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頁 40。

圖 8　晚唐，越窯八棱長頸瓶，高 22.5 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為筆者攝。

圖 9　晚唐，越窯八棱長頸瓶，高 21.7 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為筆者攝。

圖 10　晚唐，越窯鼓腹長頸瓶，高 22.4 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為筆者攝。

圖 11　晚唐，越窯八棱長頸瓶，高 22.1 公分，私人藏。圖版取自越窯博物館，《南青北白——越窯與邢窯瓷特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頁 38。

圖 12 晚唐，越窯鼓腹長頸瓶，高 22.3 公分，私人藏。圖版取自 Sotheby's, *Fine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 London : Sotheby's London, June.1995, LOT. 160.

圖 13 晚唐 - 五代，白瓷「官」字款八棱瓶，高 23 公分，四川成都江南館街唐宋遺址出土，成都博物館藏。圖版取自成都博物館主編，《花重錦官城——成都博物館歷史文物珍》，四川：四川美術出版社，2018，頁 165。

圖 14 唐，邢窯白瓷圓柱形標本，殘長 9 公分，直徑 1.9-2.5 公分，2012 年邢窯窯址調查採集。圖版為筆者自攝。

圖 15 晚唐，白瓷「盈」字款八棱罐，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片取自趙慶剛、張志忠主編，《千年邢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 170。

圖 16 十世紀後半，敦煌觀音菩薩坐像手中的淨瓶，法國吉美博物館藏。圖版取自ジャック・ジエス編，《西域美術：ギメ美術館ペリオ・コレクション》，第 1 卷，東京都：講談社，1994，彩色圖版 68-1。

圖 17 九世紀中期，十一面觀音菩薩立像，高 194 公分，日本滋賀向源寺藏。圖版取自水野敬三郎、紺野敏文等編著，《密教寺院と仏像：平安の建築・彫刻 I》，收入《日本美術全集》，第 5 卷，東京：講談社，1992，彩色圖版 63。

圖 18 晚唐，敦煌壁畫十一面觀音像手中的淨瓶，敦煌 14 窟南壁。圖版取自敦煌研究院（段文傑主編，彭金章分冊主編），《敦煌石窟全集密教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圖 75，頁 103。

圖 19 九至十世紀，貼塑凸棱裝飾的玻璃長頸瓶，私人藏。圖版取自謝明良，〈臺灣故宮博物院藏兩件汝窯紙槌瓶及相關問題〉，收入氏著，《陶瓷手記——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軌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圖 31。

圖 20 十一世紀，玻璃長頸瓶。圖版取自 Shinji Fukai, tr. by Edna B. Crawford, *Persian Glass*, New York, Tokyo, Kyoto: Weatherhill/Tankosha, 1977, fig.75.

圖 21 十一至十二世紀，斜紋玻璃長頸瓶。圖版取自由水常雄編，《世界ガラス美術全集 1 古代到中世》，東京：求龍堂，1992，頁 103，圖版 211。

圖 22 古代西方玻璃器中凸棱裝飾工藝示意圖。圖版取自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岡山市立オリエント美術館編，《古代ガラスの技と美：現代作家による挑戦》，東京：山川出版社，2001，頁 71。

圖 23 晚唐，凸棱貼塑裝飾的邢窯白瓷標本，2013 年河北內邱邢窯遺址調查採集。圖版為筆者自攝。

圖 24（傳）唐代張萱〈唐后行從圖〉。圖版取自龍美術館編，《敏行與迪哲：宋元書畫私藏集萃》，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6，頁 48。

圖 25〈唐后行從圖〉中手捧八棱瓶的侍從。圖版取自龍美術館編，《敏行與迪哲：宋元書畫私藏集萃》，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6，頁 48。

圖 26 王處直墓（924）壁畫中手捧鼓腹長頸瓶的仕女。圖片取自河北文物研究所等，《五代王處直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彩版 22。

圖 27 王處直墓西耳室壁畫復原線圖。圖片取自河北文物研究所等，《五代王處直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 27-29。

圖 28 十二世紀，高麗青瓷鼓腹長頸瓶，高 33.5 公分，韓國三星美術館藏。圖版取自三星美術館官網 http://www.leeum.org/html_eng/collection/traditional.asp，檢索日期：2018 年 1 月 10 日。

圖 29 王處直墓浮雕線繪圖中手捧鼓腹長頸瓶的仕女。圖版取自河北文物研究所等，《五代王處直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 37。

圖 30 馮暉墓（958）壁畫中手捧鼓腹長頸瓶的仕女。圖版取自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五代馮暉墓》，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頁 55。

圖 31 劉廷斌墓（961）壁畫中手持鼓腹長頸瓶的侍從。圖版取自徐光驥主編，《中國出土墓室壁畫全集 2 山西》，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圖 104，頁 114。

圖 32 遼，長柄銀壺，高 65.3 公分，內蒙古赤峰市克什克旗遼墓出土，赤峰市博物館藏。圖版取自高延青主編，《內蒙古珍寶金銀器》，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7，頁 162。

圖 33 北宋 - 金，汝窯八棱瓶標本，河南寶豐清涼寺汝窯窯址出土。馮澤洲攝。

圖 34 北宋，汝窯八棱瓶標本，河南寶豐清涼寺汝窯窯址出土。王依儂攝。

The Porcelain Octagonal Vase and Related Issues in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Period

Qiu, Ning-bin
Shanghai Fine Art Publisher

Abstract

The basic feature of the porcelain octagonal vase in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is that the long neck, belly and neck are decorated with eight raised ridges, and there are also those with no decoration and a round belly. This article first sorts out the relevant materials of the octagonal vase, focusing on the Yue kiln celadon octagonal vase specimens unearthed at the Housiao kiln site at Shanglin Lake, Zhejiang, in recent years, as well as the two newly discovered Xing kiln white porcelain octagonal vases. Furthermore, it discusses the decoration of the octagonal vase and considers that its shape comes from Islamic glassware. The focus is on the function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octagonal vase. It is believed that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Buddhism and may have been used as a "perfume vase," "seven-treasure vase" and "purifying vase." Combined with the image *Tanghou xingcong tu* 唐後行從圖 and tomb mural materials, it demonstrates that octagonal vases were used as a cleansing and ceremonial utensil in secular life to wash and add fragrance. Finally, it is pointed out that porcelains in the shape of octagonal vases also appeared at the Ru kiln and among Goryeo celadons in later generations, which deserves attention.

Keywords: Octagonal vase, Yue Kiln, Xing Kiln, Buddhism, glassware, perfume bottle

圖 1-1　越窯八棱長頸瓶　晚唐　殘高 15.2 公分　浙江慈溪上林湖後司嶴窯址出土

圖 1-2　越窯八棱長頸瓶（黏連匣缽）　晚唐　通高 20.2 公分　浙江慈溪上林湖後司嶴窯址出土

圖 3　越窯八棱長頸瓶　晚唐　高 22.3 公分　1956 年陝西西安西郊棗園唐咸通十二年（871）張叔遵墓出土　陝西歷史博物館藏

圖 1-3　越窯八棱長頸瓶標本　五代　殘高 6.4 公分　浙江慈溪上林湖後司嶴窯址出土

圖 2　越窯八棱瓶腹部殘片　晚唐　1954 年陳萬里浙江上林湖採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4　越窯八棱長頸瓶　晚唐
殘高 19.5 公分　1978 年
餘姚縣文管會上林湖採集
餘姚市博物館藏

圖 5　上林湖越窯窯址採集、發掘青瓷標本　晚唐

圖 6　越窯八棱長頸瓶　晚唐
高 21.5 公分　1987 年陝西
扶風法門寺地宮中室出土
（874）　法門寺博物館藏

圖 7　越窯鼓腹長頸瓶　晚唐　殘高 10.4 公分　浙江慈溪上
林湖後司嶴窯址出土

圖 8　越窯八棱長頸瓶　晚唐　高 22.5 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9　越窯八棱長頸瓶　晚唐　高 21.7 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0　越窯鼓腹長頸瓶 晚唐　高 22.4 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1　越窯八棱長頸瓶 晚唐　高 22.1 公分　私人藏

圖 12　越窯鼓腹長頸瓶 晚唐　高 22.3 公分
私人藏

圖 13　白瓷「官」字款八棱瓶
晚唐 - 五代　高 23 公分
四川成都江南館街唐宋遺
址出土　成都博物館藏

圖 14　邢窯白瓷圓柱形標本 唐　殘
長 9 公分　直徑 1.9-2.5 公分
2012 年邢窯窯址調查採集

圖 13b　白瓷「官」字款八棱瓶　底部

圖 15　白瓷「盈」字款八棱罐 晚唐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16　敦煌觀音菩薩坐像手中的淨瓶　十世紀後半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

圖 17　十一面觀音菩薩立像　九世紀中期　高 194 公分　日本滋賀向源寺藏

圖 17b　十一面觀音菩薩立像　局部

圖 18　敦煌壁畫十一面觀音像手中的淨瓶　晚唐　敦煌 14 窟南壁

圖 19　貼塑凸棱裝飾的玻璃長頸瓶　九至十世紀　私人藏

圖 20　玻璃長頸瓶　十一世紀

圖 21　斜紋玻璃長頸瓶　十一至十二世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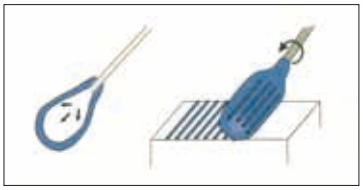

圖 22　古代西方玻璃器中凸棱裝飾工藝示意圖

圖 23　凸棱貼塑裝飾的邢窯白瓷標本　晚唐　2013 年河北內邱邢窯遺址調查採集

圖 24　傳唐　張萱
唐后行從圖

圖 25　唐后行從圖　局部
手捧八棱瓶的侍從

圖 26　王處直墓（924）壁畫中
手捧鼓腹長頸瓶的仕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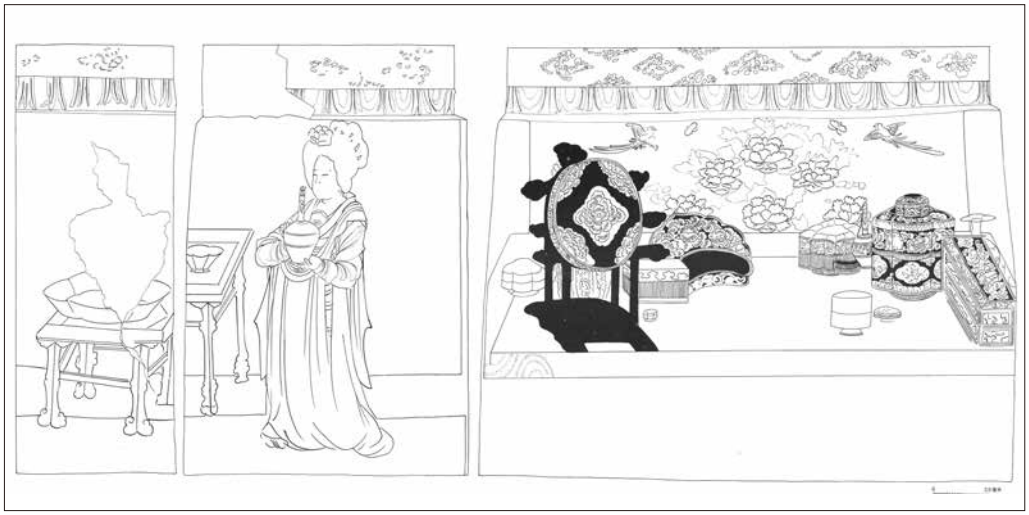

圖 27　王處直墓西耳室壁畫復原線圖

圖 28　高麗青瓷鼓腹長頸瓶
十二世紀　高 33.5 公分
韓國三星美術館藏

圖 29　王處直墓浮雕線繪圖中手捧鼓腹長頸瓶的仕女

圖 30　馮暉墓（958）壁畫中手捧鼓腹長頸瓶的仕女

圖 31　劉廷斌墓（961）壁畫中手持鼓腹長頸瓶的侍從

圖 32　長柄銀壺　遼　高 65.3 公分　內蒙古赤峰市克什克旗遼墓出土　赤峰市博物館藏

圖 33　汝窯八棱瓶標本　北宋 - 金　河南寶豐清涼寺汝窯窯址出土

圖 34　汝窯八棱瓶標本　北宋　河南寶豐清涼寺汝窯窯址出土